

# 莫斯科記

雷翁·傅克脫惠格 著 吳大琨 譯

編審室  
第 號  
字第 2313 號



內政部編審室  
註冊 2313  
備案 號 0246  
分類



生活書店發行

748.89  
906  
2

# 莫 斯 科 記

著 格 惠 脫 克 傅 · 翁 雷  
譯 現 大 吳

編 審 監  
號 號  
第 第  
字 字



3 0661 2346 8

生 活 書 店 發 行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七 年 十 一 月

蘇 聯 出 版 社  
吉 爾 斯 基

984381

# 目錄

譯者序	一
作者前言	一
第一章 工作與休息	一
第二章 一律主義與個人主義	二七
第三章 民主與獨裁	四五
第四章 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	五九
第五章 戰爭與和平	六七
第六章 史太林與托洛斯基	七五
第七章 托派審判案中之已發表的與未發表的	九一
第八章 憎與愛	一一五

## 譯者序

這一本小書是根據去年倫敦高倫茲公司（Victor Gollancz）出版的一九三七年莫斯科譯述的。原著者雷翁·傅克脫惠格（Lion Feuchtwanger），是一位被希脫勒所驅逐出境的德籍猶太作家。

這雖然不是一本理論書，可是實際上却是很像一本理論書的。作者不但在這本書裏告訴了我們蘇聯的真相，同時也還解釋了許多問題，尤其是對於托洛斯基的批判，作者是很用了一番力氣的。

中國今天是在抗戰中；而蘇聯是我們的朋友。因此，對於蘇聯的增多瞭解，自然是有其必要的。國內已好久沒有關於介紹蘇聯真相的專書出版了；我想這本小書也許正可以拿來填補這個缺陷。如果有什麼人能因此對蘇聯發生興趣，

繼續作更進一步的研究，那麼，譯者這一月來所犧牲的睡眠與休息時間就可說因此得到報酬了。

一九三八年十月三日晨兩時半

大理記於「孤島」。

## 作者前言

正確地說來，這本書是應當叫做：一九三七年正月的莫斯科的，因為在莫斯科的一切事情都變得非常快，有許多觀察者的話，只在幾個月之內，就失掉了他的真確性了。我會碰到過那些很熟悉莫斯科的人，當他們離開了六個月之後再看莫斯科時，就幾乎已不能再認識他自己的城市。不過我終於只用了「一九三七年的莫斯科」這書名，這是因為我並不打算將莫斯科來作一個十分精確而又客觀的描述的緣故。經過了一個十星期的旅行，就想有什麼大成績，這是不可能的。我原想在這本書內，對那些急切想知道我對於莫斯科有些什麼意見以及我所在那裏看到些什麼東西的我的朋友寫下一些我個人的感想而已。

正因為這樣，所以我是充分明白一切我所下的結論都是完全屬於我個人的。

我只是幫助了在我訪問蘇聯時所發生的一切希望與我的擔心，至於這些景像到底有什麼是經了我個人的感覺或者先入之見的影響，那只能讓讀者自己去估價

我是為一個同情的訪問者出發的。對於將一個巨大的國家的建設完全依據了理智而建設的偉大實驗，我是毫無疑問地同情的，而我的到莫斯科去也是希望能實驗的成功。不論我對於私人生活之間的感情以及批評精神是怎樣希望着它少除去，也不論顯現在我眼前的只是怎樣一個完全理智的東西，我總完全相信如果要能會制度繁榮，是必須將它的基礎建立在公正與理智之上的。我們在這的這經驗過太多當國家與法律不是建立在理智上而是建立在偏見與這何怖事情了。整個的一部世界史，照我看，也就是一小羣有思想的人與一大批愚笨的人不停鬥爭的歷史。我是時常將我自己放在贊成理智的這一邊的。因此，當然，毫無疑問地我是要對那正在莫斯科從事進行的偉大實驗同情的。

的。

不過，在最初的時候，我的同情還滲雜着懷疑。實際的社會主義只能用階級鬥爭的手段才能建立起來，因此這也就等於說蘇聯也只是一種獨裁政權而已。因此，托爾斯泰說作家，而且因為了我的必須將我所感到，想到，看到，以及經驗到的事情，事情寫人，階級，政黨以及意識的限制就受了內部的衝動將它表現出來，所以，雖則我的個人傾向是屬於蘇聯，我對於莫斯科也不能不有些懷疑。蘇聯現在已經頒佈了一種自由而又民主的憲法，那是確實的。但我也已經從各方面聽到了很多關於這種憲法上的自由是受着很多惡劣的歪曲的傳說，而自從我在動身以前看到了安特列·紀德的一本小書後，我的懷疑是更加確定了。

因此，當我到達蘇聯邊境的時候，我是充滿了同情，也同時充滿了驚奇與懷疑。我所在莫斯科受到的優待更增加了我的不安。我的許多好朋友，以及，許多十分聰敏的個人都曾經將他們的判斷為德國的法西斯蒂所蒙蔽過。因此，我也就

懷疑對於我，是不是一切人與物的形態都已經因了我個人的關係而變成歪曲。同時，我又告訴我自己，我恐怕是只能看到蘇聯成功的一面，因為像我這樣一個對於蘇聯語言完全不懂的人，實在很難深入到一切事物的內部去，看一看那些也許爲我而佈置下的烟幕以外的事情。

在另一方面，在莫斯科，一個人也往往非常容易因了那些使得日常生活困難的許多小的不舒適而對於緊要的事情反而忽略，以至發生出一種不公正的反對的意見來。我到了莫斯科不久就發現甚至像紀德那樣優越的作家也已經爲這種許多小的煩擾而將他的判斷歪曲了。而我自己，則也同樣地感到在莫斯科要保持一種公平不爲從各方面劇烈來影響我的喜樂與煩燥所動，實在非常不易。

蘇聯人民的那種天真的驕傲，以及熱情，常常使得我很難得到一種公平，同時又正確的估計。蘇聯的文明是年輕的，它是在一種無比的苦鬥以及貧困之中建立起來的。因此當有什麼客人到了莫斯科而這些客人的意見，蘇聯的人民又都認

爲是重要的時候，他們一定立刻就會對他提出許多問題問他是不是對這個事情歡喜，對那個事情有什麼意見。而且，我去的時候，又正是一個多事之秋。法西斯蒂的領袖們正在對蘇聯作着恫嚇與挑戰的演說，在西班牙，在蒙古邊境，又都有着戰事；在莫斯科自身則一個激動着羣衆的政治審判正在進行，一大羣的問題是產生了，在莫斯科的人民是決不會不將這些問題提出來問人的。不過我總慢慢的才形成我的意見，喜歡平心靜氣地將贊成與反對方面的理由都考慮一下，因爲要這樣才能避免一個急促而欠週密的判斷。當然，有許多事情，是爲我所不喜歡，而且作爲一個作家，我常常也帶幾分自負地將我所想到的就完全說出來——這種傾向曾經不至一次地造成了不少難堪場面。即使在蘇聯境內，我是不願意將我所認爲必須說的批評按下不說的；但既是在一個多事之秋，因此對於一個被尊敬的客人就時常很不容易找到一種合宜的方式來發表他的批評，同時又避免魯莽與不敏行爲的發生。

使我能夠很快樂的說的是：我的坦白總算不會被誤解過。新聞紙總是照我所說的刊登文章，即使在有許多時候，那種意見或者是不爲當局所歡迎的，如我的要求在某幾方面更大的寬容，對於那種過度的而且有時竟是粗俗的崇拜史太林表示驚奇，以及我的對於托派審問各方面說明的表示不夠等等。在私人的談話中間，同樣的，那些領導者也都充分表示了他們是願意接受批評以及彼此都願以坦白相見。我所用以表示我的批評的那種率直態度使我也同樣地得到了許多如果我不是那樣決不能輕易得到的報告。

在我回到西方的時候，因此我不得不決定到底我要不要將我所在蘇聯看到事情告訴出來。如果，我也像別的人一樣，只在蘇聯看到一點好處而別的都是壞處的話，那是決不會有問題的。這會使很多的人反而高興起來。可是我却在蘇聯，光明面比了黑暗面看得更多。而蘇聯是至今還不爲人所讚揚的，因此任何事情我所需要說的，我立刻就發覺是一定不爲人所歡迎的。在莫斯科的時候，我並

不曾發表了多少我的意見，發表的一共還不到兩百行字，這可算是夠少的了，而且內容也並不是完全無條件的稱讚；不過，即使只有這幾行字發表，因為了他的並不是完全求人的諒解，所以已經遭受到了很多毀謗與詬罵。我難道還要再多說關於蘇聯的事情嗎？

我已經為我的努力去觀察以及清楚地企圖去獲得理解弄得非常疲乏。因此，在我歸後的第一天，我就對我自己說，我的任務是在使一切事情都形像化地表現出來，而並不一定要限於表示意見，所以我就決定一直到我的經驗已經結晶化了的時候為止決不開口。

可是這個藉口，到底並不會能使我的良心長久安靜下來。蘇聯現在是正在與許多的敵人從事搏鬥，她所從她的同盟者那裏得到的還都只是半真半假的支持。一切人間的愚笨，惡感，以及憎性都在那裏作祟使得對蘇聯的每一件事可以有結果的事情都在懷疑，毀謗以及否定。一個作家，如果他真看到了一些偉大的事情決

不應當把他的證據捺住而不發一言的，即使那事情是還不爲大家所讚揚，而那作家的說話是也要因此不爲衆人所歡喜。

因此我就終於決定站出來作爲一個證人。

## 第一章 工作與休息

當我到蘇聯去的時候正是別的許多國家都充滿了怨恨而且那些國家的人民也都不論對他們的精神生活，或者物質生活表示不滿，要求改革的時候。從在法西斯蒂主義專政下面的人民方面發出的那許多失望的呼聲，更是比了別的任何各處來得利害，雖然在法西斯主義國家裏，任何批評是都被看作叛逆，而且要受處分的，可是這種對於人民要送去坐牢或者送入集中營去作苦工的恫嚇到底還是壓抑不住憤怒與絕望的呼聲。

因此當我在最初與所有我在蘇聯接觸到的人民碰到的時候——這包含許多偶然的以及完全是自然的接觸——看到他們即使有時也有一些對於小的地方的批評但大體上都是一致的對於事物有個計劃的時候，不禁使我感到了驚奇與懷疑。真

的，在那個莫斯科大都市裏是到處都有着一種和穆與滿足的空氣，甚至可說是快樂的空氣的。

有好幾個星期我都懷疑恐怕這些現象是假的，因為在莫斯科事實上還是缺少着很多在我們西方人看來是完全不可缺少的東西。

是的，飢餓的年頭是已經過去了，在許多的店舖裏各種食物都可以大量的得到而且價格也都在一般普通的蘇聯居民工農的購買力之下。各種製漬物更是特別的便宜而且比普通的好。根據統計，在蘇聯的每一人口的所能得到的食品，是比了在德國或者在意大利的人民要好而且多，而這些統計，根據我個人在那邊短期停留的經驗，是完全正確的。蘇聯人民有着中等收入的已經可以在招待一個貴客時用着很豐盛的菜。雖然，在另一方面，這些食品的養成往往缺少着一種好的藝術手腕。可是莫斯科的人民顯然是滿意於他的食品的，因為這是一直在最近，他的廚房才變成這樣充實的。在從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三六年這兩年來，莫斯科每

一人口的食品銷耗量已經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八點八，而將現在的情形與戰前的統計作一比較時，則每一人口的肉與脂肪的銷耗量，已經在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三七年之間增加了百分之九十五，糖增加了百分之兩百五十，麵包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五十，玉蜀黍是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五。經過了這樣許多年的飢餓與貧乏，莫斯科的居民當然決不會對他今天的食品有所不滿了。

此外，如果有什麼人知道莫斯科早期的情形，他一定也會為今日一般居民的衣着改進而吃驚。單在一九三六年一年，化在衣着上的銷耗，就已經增加了百分之五十點八，雖然現在如果有什麼人是第一次去訪問莫斯科，他一定還會感到莫斯科一般居民服裝的標準是極其低下的。幾種主要的衣具東西，現在是已經能夠得到了，而且有幾種，例如羊皮與橡皮是特別來得便宜，但這些東西中間有一大部份還是非常珍貴的。所以舒服，現在是還說不到。如果有什麼人不論男女，要穿着得好，而且要合他胃口地穿着，是一定要感到相當麻煩的，而且即使遭受

了麻煩，也許仍還是不能成功。我有一天招待幾個朋友，在這些朋友中間只有一個女劇員穿着得最好，她的服裝受到了大家的讚美。但她後來承認：「我是從戲院裏去借來的」。

對於任何從西方去的人，莫斯科是還很顯明的缺少着許多旁的日用必需品。譬如紙張的種類，就非常少，而且店家的存貨也不多；藥用必需品以及化妝品也同樣的非常少。而且經過一個各店家的調查，表示出有許多東西都是非常粗劣的。但在另一方面也有許多東西如寫字桌上的電燈，貯煤油的機器，照相機，以及留聲機等，是非常價廉物美的。客觀上的需要是跟着社會上的繁榮在那裏增長。在過去貧窮的年頭中，如果說人民只要有了日用必需品就夠了，現在則已經普遍的有了一種奢侈品的要求。這種社會上的要求現在已超出了生產的限度，因此在各店家的門前，我們是時常可以看到買物者排了隊伍在等候購買的情形。

此外還有一些缺點使得在莫斯科的日常生活發生困難。譬如公共的運輸，運

轉是確實很有効力的，莫斯科居民對於他們的地下鐵道的自負，也是很合理的；因為這無疑是世界上最好與最舒適的地下鐵道，但是電車畢竟還是太擁擠了；公共汽車也不容易乘到。有一次我有一個住在離莫斯科二十五里之外地方的朋友因為經過了好幾小時的擠軋還是得不到行李票，終於脫掉了他的車。

莫斯科的有一部份官廳機關也是牽制着日常生活的。無論是租房子，旅行，汽車加油，以及去參觀大的公共建築其他等事都必須得到核准與允許。所以「批准」是一個外國人跑去時第一個必需學習的俄國字。此外，如果一個外國人要游覽也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莫斯科的近郊，飯店與旅館只有很少的幾家，可是休息室卻是很多很多的，這些休息室都只對它所屬的職業組織的會員才開放。一個外國的授權公使有一次曾對我說——他說這話時當然有一半是帶着說笑話性質的——他常常在休假日只能很羨慕地站在工人游泳池的外邊看，可是沒有一個地方能夠得到允許進去。

在莫斯科感到最糟糕的還是住宅問題。絕大多數的人口都是擠住在許多普通的小房間內，而這些小房間一到冬天是幾乎差不多一點都不通空氣。到廁所去有的時候也得排了隊等候。重要的政治家，作家，以及科學家，有着很大收入的，比了西方的平民還要住得蹙腳。

所以我時常懷疑，特別是在我初到莫斯科的第一星期內，到底這許多日常生活的不方便是不是不在破壞我所已經說過的那種人民的滿足；可是事實上，情形竟完全不是那樣。蘇聯人民是已經忍受過許多年月最窮苦時候的情形。那些電燈與水都非常缺少，他們一定要長長的排了隊買麵包與青魚時候的情形，這很清楚地保存在他們的記憶裏。而現在他們的經濟建設計劃，是已經很清楚地證實了它自己的成功。許多重大的生活上的困苦也都除去了，所以莫斯科的通常居民，對於那些現時生活上的許多小的麻煩，即使有時也要偶然用了一種極純正的幽默態度來取笑它，但他們總從來不會想到讓這些小的缺點來抹煞去只有在蘇聯生活才

能有的偉大事物的。所以如果您太時常提到他們那許多日常生活上的小缺點時，他們一定會採取進攻的態度，把情形反過來，宣稱說站在他們的立場上，是永遠也不能想像出您怎麼能夠會忍受下去，在一個資本主義社會內生活的。

『當您的四週都充滿了腐敗空氣的時候』，他們問我，『您怎麼能夠生活下去呢？即使您自己現在還可以很和平而安適的生活與工作，但您怎麼能夠不爲您自己四週的悲慘事情所打擾，而那許多悲慘事情又只要有一個合理的社會制度就可以除去呢？您不爲那些到處都是的愚蠢行動所打擾嗎？您怎麼能夠生活在那種經濟情形不是決定於合理的計劃而是決定於私人要求發財的企圖的國家裏呢？您難道不爲您的不固定的，一無積蓄的，每况愈下的生活所煩惱嗎？根據德國的統計，六千五百萬人口中，每天竟有五十二個人要自殺。我們有了一萬八千萬人口，可是每天因了各種原因自殺的卻只有三十四人。而且您只要看一看資本主義國家裏的青年，再與我們的青年來比較一下，就知道了。在西方的青年朋友，有

多少是能夠依照了他們的志願，他們的能力而找到職業的呢？而在我們的青年中間又有幾個是不能做到這地步的呢？有多少您的青年人民是不在焦急着他的將來的呢？

這許多論證都決不僅僅是宣傳而是完全從一深刻的信仰中產生出來的。在整個的國民經濟結構後面有着一個計劃，這事實安慰了一切個人在他私生活上的缺陷——如果他是認為有缺陷的話。那種存在在過去與現在之間的顯著不同，已使得人民很容易地忘記掉了任何不滿。隨便什麼人只要他是有眼睛可以看，有耳朵可以聽，辨別人們談話中間的真與假的一定會在今天的蘇聯任何各處，感到蘇聯人民所談起的他們『快樂之生活』，決不是假的。

蘇聯人民是知道他們的繁榮並不是什麼也許永遠不能實現的夢想而是一個合理計劃的必然結果的。他們並且也知道他們是必須先造起了房子的屋基，然後才能去談房屋內部的裝修。所以必須先將原料取得了，重工業建立起來了，機器也

有了，然後才能開始去生產消費品以及一切製造品的。蘇聯的人民是瞭解了這些，然後才準備去忍受一切在他們私生活上的不滿的。而且現在已經非常明顯的，每個人都知道這個計劃是對的，所下的種子也都是合理的，一個富饒而且快樂的收穫就將可以實現了，蘇聯人民是正用着十二分的滿足在快樂地享受着他第一次收穫的果子。他們看見今天，正同他以前被允許過的那樣有了成千樣的東西，而這些東西在過去兩年前，是他們所夢想都不敢夢想到的。今天一個莫斯科的人民，當他跑進他的商店去的時候，是正同一個下過許多種子的園丁，跑去園裏看他又有什麼新的東西生長出來一樣的。每天，每天，他都看到一些新的東西——他滿足地看到了有了睡帽又有了鈕扣，又有了照相機……而那些政府裏的領袖們的說話，都已經兌現。這件事實就是給與人民的一個保證，告訴他們計劃是一定會繼續實現的，同時一切的物品，也一定會一月比一月好地改進的。正同莫斯科的人民，正確地知道到列甯格勒去的火車一定在什麼什麼時候開一樣，他們也正

確地知道在兩年之內，他們將有很多的衣服，在十年之內，他們將有房子，以及其他一切隨了時間而可以有的東西。

農民們更是最深深地理解到存在在困苦<sub>的</sub>過去與快樂的現在這中間的不同，而他們，又正是構成人口中間絕對大多數的人。他們從來不會厭倦於將這種不同，來加以一種敘述。父母們總是不斷地將過去在沙皇時代的那種悲慘與黑暗的生活告訴給他們的子女聽。這種生活我們是可以從俄國的古典著作描寫中間知道一二的。在那個時代，農民們最好也不過可以吃喝一些開水，一點茶以及乾硬的麵包過活。他們是既不能讀，也不能寫的。他們的心靈裏所充滿的就只有一個狹隘的關於幾件使用物品名字的字彙以及一些片斷的由主教來告訴他們的神話。可是現在這些人民已經有着大量的食物了。他們已經很巧妙地進行耕種，而且不斷地得到成功了。他們有了衣具，照相機，無線電，戲院，也有了報紙。他們已經學習到了讀書與寫字，他們的子女也已經能夠依照了他們的志願而得到職業。

因此，經過了二十多年的經驗，人民所得到的這一種認識，知道國家的確不是在保持了什麼好東西給少數人不給大多數人享受，而是確然在用着最合理的方法幫助着大家，這種認識已經與全人口的心理打成一片，同時使對領袖們產生了一種我在別處從來不曾看到過的信仰來。在西方，因為屢次的失信，人民對於政府所有的一切保證與諾言，已經完全不發生信仰。無論政府說要舉辦什麼，人民一開始就認為是絕對不會實行的。可是在蘇聯剛巧相反，人民對於當局的任何諾言，是都完全相信着一定會實現的。在西方，一個法西斯主義國家，如果強迫要人民有一些『自然的快樂表示』，我們知道是真不知要用多少功夫才辦得到，可是在莫斯科，當羣衆們舉行遊行時，我是到處都看到了人民真正快樂的表示。

蘇聯人民所享受到的利益保障，與西方各國的人民比較起來時所有的不同，無疑的，蘇聯的人民是感到太巨大了。與這些利益比較起來他的日常生活間的那許多不方便，是一點都算不得什麼的。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保證了每一個人

可以永久有職業，而且還可以有一個享福的老年。失業與剝削是根本取消了。國家所要求每一個人替他做的工作，事實上總還留下一大部份時間可以讓他照了他個人的興趣去活動。每六天是一個星期日，每天工作七小時，而且每年還有一個月假期，薪水照拿。私人的住屋雖然不好，但當蘇聯人民休假時是可以儘量去住那種高爽而又明亮的旅館的，那種旅館是專歸工人休假時用的，數目既多，價錢又便宜。

因此，莫斯科的人民，常常很得意的提起：『我們的工廠』，『我們的農業』，『我們的建築』，『我們的戲院』以及『我們的軍隊』，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這些人民是的確已經感到國家是真爲了他們的，而並不是他在那裏爲國家。而他們所尤其感到驕傲的，是當他們提到『我們的青年』的時候。

青年，當然是蘇聯最重要的財產。

一切的事情，可說都是爲了年輕的一代做的。我們在蘇聯隨便什麼地方都可

遇到許多優良而特別指定的托兒所與幼稚園。在全國，並且到處都有着學校，學生的人數也正在飛躍的增加着。此外尚有着無數的兒童遊戲場，兒童電影院，兒童咖啡館，以及優良的兒童劇院。年長一些的青年則在各種的大學，與職業訓練所，農民集體經濟制，以及紅軍的文化中心內受着訓練。蘇聯青年所由生長起來的物質環境，是比了世界上的任何一處都要來得好。

大部份我所從蘇聯之外的青年人那裏收到的信，可說都是告急的信。無數在西方的青年們一點都不能得到他們物質上或者精神上的發展，他們不但沒有希望得到他所願意做的工作，而且還沒有希望得到任何工作。他們不知道應當向什麼方向走，也不知道他們的生命有些什麼意義：所有的路看上去好像都是不通的。

有過了這些經驗，再來接觸到這些已經身受到蘇維埃事業利益的青年，這些從農民與無產階級中間生長起來的青年智識份子，真是多麼令人高興的一件事。這些青年對於生活真是強壯而且充滿了冷靜的信仰，他們是深刻地感到了他們是

整個社會有機的一部份。未來在他們就像是一條已經舖築好了而且是把目的清楚地預定下了可以達到風景勝地去的道路。所以不論當他們是在會場上說話，或者是在私人談話之間說話，提起『他們的快樂生活』時他們一定一點也沒有作偽的要表現出他們天真的熱誠來的。他們是不可能把那種充滿在他們四週的快樂掩飾過去的。譬如有一次，一個技術學校內的青年女學生，她在幾年前還是一個女工，就曾對我說：『幾年以前我還不能夠寫一句簡單而正確的俄文，可是今天我已經能夠用相當不錯的德文和您討論美國汽車工廠的組織問題了』。另外還有一次，一個從鄉間來的女孩也在一次會場上聲稱道：『四年以前，我是既不能讀書也不能寫字的，可是今天我已經能與福克脫惠格自己討論他的書了』。他們的這種自負看起來都是很正當的。這是從一種對於蘇維埃世界以及他所在那裏面佔到的地位深深感到滿足後，才爆發出來的表示，所以甚至聽的人也因此不能不與說話之人同樣地有得意洋洋的感覺。

根據西方各國的統計，在學生中間，出身於農民以及無產階級的學生，其所佔的百分數是非常低下的——而這樣的結果，當然是會使許多有才能的人，僅僅因為了他父母的貧窮，而就此必須放棄掉他的發展機會；而在同時有許多蠢笨的人則反因了他們的家庭有錢而不得不去強迫地念着書。所以在蘇聯當我們看到那些千百萬在二十年以前，一定是會給社會所丟棄掉，變成完全無智的人的，現在也熱心地在擁擠着走進學校去時，真是很使人感動的一件事，這些學校的大門現在是對他們開放了。蘇聯是正同她在地下掘出了許多從前他所不會用過的寶藏一樣，他也在人力上培養出了許多一直到那時還止不會用過的人力來。這兩件事情是都同樣地成功的。農民以及無產階級的子女們，現在是正在飢渴地用着他們年輕的腦筋吞食而且消化着放在他們面前的一切新材料，他們的那種新的力量還給三千多年來的人類智識找出了新生的一面來。這件事，實在是大大可安慰那些經過了戰後的經驗，差不多對人類文明的將來絕望了的人的。

安特列·紀德曾經說起過蘇聯青年的愚蠢與傲慢。他告訴我們他是怎樣被訊問了很多的問題，如是不是在巴黎也有地下鐵道的，俄國影片怎麼也會在法國開映的，以及蘇聯青年們又怎樣傲慢的表示過再化時間去學習外國文已經完全無用，因為他們現在已經沒有什麼東西再要向外國去學習了。可是這些說話，當無論誰看到蘇聯的報紙，正在經常地將各國的地下鐵道與莫斯科的地下鐵道作比較，而且也常在那裏慶賀他們自己影片的成功，特別是在法國的成功時，一定會感到安特列·紀德所偶而碰到的青年是完全特殊的魯莽與愚蠢。我雖然也曾經有過無數次與蘇聯青年的說話，可是我從來不會在什麼地方碰到過有這種問題向我提出。不但如此，而且我是非常地感到驚奇因為我所碰到的那許多青年學生，他們往往都知道德文，英文，或者法文，或者甚至兩三種語言他們都懂的。

對於一個作家，當他知道他的書在這些蘇聯青年的圖書館內也有着時，當然是很愉快的。在這個世界中的每一個國家內差不多都有很多讀者常要向作者提出

許多問題來。不過，在西方，書籍有的時候是完全僅僅只作爲一種消磨時間的奢侈品。而在蘇聯則每一個讀者好像對於書中所說的世界就完全看作是他自己的世界一樣。他向書中人物所採取的態度就正同他向他所熟識的人所採取的態度一樣——他要和他們爭吵，叱責，他們非常尖刻地看着書中的每一件事與每一個人。我曾經有好幾次機會與那些普通工廠裏的工人，工程師，工作者，夥計，討論我自己的書。他們對於這些書都有着非常完全的認識，有時候甚至超過我自己所有的。因此要對付那許多他們所提出來的問題，可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這些年輕的農民以及無產階級的智識份子，常常要提出許多出人意料的問題來。他們雖然很客氣地辯護他們自己的意見，可是都非常堅決而且頑強。他們絕對不允許作者用什麼美學上的，或者文學技巧上的話來作遁辭。在他們看來，作者既是這些書中人物的創造者，他是必須對他們負責的，而如果作者對於這些青年讀者所提出的問題僅僅只是敷衍的回答時，那麼他立刻就可以發現他們的不滿足的。因

此，在與這些人的談話中間，當然是有很多的東西是可以學習到的。

這種從蘇聯青年處所自然流露出來的力量，以及快樂的感覺，當然同時感染着很多人，而且使得我們可能去瞭解爲什麼蘇聯的人民對於將來是有着那麼多的信任——這種信任，就是使得他們目前不至對於他們生活上的缺點不滿的力量。

我想也許下邊這一個例子更可以明顯的表明蘇聯人民對於現狀的滿足是與他對於未來的信任完全聯在一起，不可分開的。

我已經講過莫斯科房子的擁擠情形，那裏每個人就像許多羊在羊圈內一樣地擠着。但是莫斯科的人民是知道建築也正與旁的事情一樣是必須遵照了先有公家而後有私人的原則發展的，因此現有的公共建築的美滿良好，也就等於給了他一種安慰。那許多工人的俱樂部，無數的圖書館，公園，以及運動場都是非常廣濶

而且良好地陳設了的。莫斯科的夜也正與世界上其他大都市的夜一樣的電燈通明着。莫斯科的人民常將他的大部份時間化在公共場所。他歡喜到街道上去閒逛，歡喜到俱樂部以及會議場的房間裏去。他寧可願意與人熱烈的討論什麼事情，而不願一人靜然地在那裏思慮什麼。他有了優良的俱樂部的房間因此使得他對自己的不良住宅也不覺有什麼不便了。不過，他今天的爲什麼不對他自己的醜惡住處不滿，主要的實在還是因爲他知道莫斯科在將來就將變成更好，更美麗的。

這決不只是一個空想，因爲已有過去兩年來，當局對於所化在全部改造莫斯科城市這事情上的努力，足以證明。

在一九三五年的七月，人民委員會就決定要在十年之內將莫斯科的外表也建築得像蘇聯內部機構一樣的系统而合理。而從一九三五年起所已經動工建築了的以及在此後的八年來所將要建築的東西，則已都製成了一個巨大的模型將它陳列在一個建築物的展覽會上。

我曾看見過那個巨大的模型。那個模型是裝着電燈的，用一條條的藍色，綠色，及紅色的線表示着街道，地下鐵道，以及汽車路，而且還表示着這個大都市所將要建築的房屋以及交通的系統與制度。一切的大道以及圓路，小巷，住宅，工業建築，公園，學校，政府機關，醫院，教育與娛樂場所——都有特定的場所被精確地分配着。

在這以前是從來不曾有過一個有百萬以上人口的都市能像這樣的合理的而且美麗的建築過的；因為在世界上的其他各處都有着只知道求私人利益的地主存在。這種地主若存在了就必定會使一個都市的重建計劃完全成爲不可能。譬如當一九二三年東京大地震之後，就會想合理地再建築這個城市過，可是要合理地再建築那城市，就必須先付出四千萬元來作爲向私有地主購買擴充所必需的三百畝土地的代價，於是原來的那個擴充計劃就終於只能放棄了。

可是在莫斯科，一切這樣的限制是完全不存在的。這個計劃是決不會因了要

對已有的惡勢力讓步而受到阻礙的。任何事情，在它開始的時候，就已經是那個完美的，預定的計劃之一部份了。

這個模型的設計者是邱契脫契夫 (N. S. Chruchtchev) 卡加拿維支 (L. M. Kaganovitch) 以及史太林 (J. V. Stalin)。

真的，任何人只要看到了這個偉大城市的模型，這個將它的基礎建立在完全合於事理的條件之上的模型，是一定會深深地感到滿足的。像這種樣子的城市，自有人類歷史以來，這還是第一次。當我們在對那模型注視的時候，展覽會內的建築家就開始向我們解釋。怎樣他們在第一年內即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內要在那些，那些地方建立學校，於是那些地方的電燈就亮起來，那些已經將學校建立了起來地方的燈光更特別亮，他們又指出在最初十八個月內所打算建立醫院的地方，電燈則表示着那些現在已經建立完畢的所在——那數目又是超過了原有的計劃的。如果有什麼人要想更清楚地知道這個都市的某一部份，就是說要想知道

這個模型的某一特殊部門的詳細情形時，那麼這一部份就能自動地分裂開來讓那個人深入到這個未來城市的內部去觀察，選擇他所頂歡喜居住的地方。

這個模型當然決不是玩具，也不是西方建築家的烏托邦，而是在八年之後即將變成事實的都市的縮影。不過最使人感到驚嘆的，倒還不是這個都市的偉大，或者它的建築的速率而是它的整個計劃。這個城市的每一方面的建築，雖然都是爲了應付各種特殊需要，可是從來不會忽略了整個都市的利益，或者甚至可以說不會忽略了整個國家的利益。這一點是只有在蘇聯才能辦到的。

在政府的重建莫斯科城的計劃書上寫着：『爲了執行這個計劃必須充分動員一切所可能動員的力量；可是這個計劃是必定要實現的』。

任何人只要是到過莫斯科的，他也會相信這個計劃是一定要實現的。

下面是幾條蘇聯憲法中從第一百十八條到一百二十一條的條文，標題是：

『蘇聯公民的基本權利與義務』。

『第一百十八條：蘇聯公民有工作之權，即有被分派任務並按照其任務之質與量以取得報酬之權。

『此工作權之保證爲：政治經濟之社會主義之組織；蘇維埃社會生產力之經常發展，經濟危機之免除，及失業之取消。

『第一百十九條：蘇聯公民有休息之權。

『此休息權之保證爲：多數工人工作時間之縮短至每日七小時，及每年均有規定之休假日（薪水照發），遍設各地之療養院，休息室，俱樂部等概供勞動者享用。

『第一百二十條：蘇聯公民有在其老年期，疾病殘廢時取得生活保障之權。

『此項權利之保證爲：國家普遍供給工人社會保險費，工人免費送藥之舉行，以及多數爲工人僱員而有之療養院之設立。

『第一百二十一條：蘇聯公民有受教育之權。

『此項權利之保證爲：強迫義務教育之實施，一切教育，包括大學在內，均行免費；各民族語言教育之實施，以及在一切貿易，蘇維埃經濟，機械，牽引機工作，以及集體農村內施行免費之生產，技術，農業教育』。

很顯明的，這種蘇聯的憲法與普通民主國家間的憲法是完全不同的。這不同就在普通的民主國家憲法僅只空洞地承認了公民的權利與自由，可是卻沒有什麼方法提供出來作爲實現這些權利與自由的保證。而蘇聯的憲法則是將這許多必須的物質條件完全一一列舉出來，因爲倘沒有這些條件，真正的民主，就決不能存在的。譬如經濟如不獨立，真正的輿論就不可能形成，因爲再沒有比恐懼失業，恐懼自己子女的將來，以及恐懼自己的老年能對於一個人的意見發生重大影響的了。

蘇聯憲法中的一共一百四十六條憲法，倒底有幾條是實行的，幾條是只在紙上說說的，也許還有人要爭論，但無論如何我所列舉出來的那四條——這在

我看來簡直是真正民主的基礎——是決不是僅印在紙上的說話而是完全付之實現的。您如果將整個的莫斯科城都翻了過來，我想您一定也很難找到有什麼東西是與這幾條憲法抵觸的。

因此如果有什麼人將這事實與我所已經描述過的情形聯起來考察一下的話，他一定會明白在目前，蘇聯之外，各國的普通人民雖然與在蘇聯國內同等地位的人比較起來是要來得生活舒適一些，但他的舒適是完全建築在泥沙上的。有很多人，因為意識到他四週的人的說不盡的苦楚以至他自己的特殊權益他也不能享受了，他們是為感到這種苦楚可以因了一個更合理的事物制度而避免的這事情所困惱着。而在現時，蘇聯普通人民的生活，雖然沒有旁的國內他的同伴那樣舒適，可是他卻是很滿足，很安分，而且很快樂地生活着的。



## 第二章 一律主義與個人主義

安特列·紀德有一次曾經碰到一個從事『斯泰哈諾夫』運動的工人——那就是說一個從事打破工作紀錄的工人——這個人，據紀德說，『是可以在五小時之內把八天的工作都做畢，或者是在八小時之內把五天的工作都做畢的人，實際怎樣，我已經記不清楚了，於是我就大胆地問他』，紀德接下去說，『這是不是等於說在這以前你們就需要八天才能把五小時內的工作做完呢？』紀德很驚異他的問題被冷冷地接受了下去以及他們的並不願意回答。於是這就使紀德因此對莫斯科的人民下了一個結論叫做：『懶散』。『如果說他們是懶惰，那就未免說得太過份一些了』，紀德裝作一個客觀的觀察者那樣的說着。他並且還主張如果在一個所有的工人都真正做工的國家裏，『斯泰哈諾夫運動』是決不需要的。所以他以

爲蘇聯的人民一定當他們真是自己管理自己的時候，就要變成對於工作懈怠。所以『斯泰哈諾夫運動』是發明了特地來刺激工人的。在這以前，他說，刺激工作是用鞭責的方法來實行的。

這些紀德的觀察，真是大大地驚奇了我。在我這方面說來，我是必須說，正是與紀德所說的情形相反，莫斯科人民的那種活動與勤勞的情形使我大大地受了感動。他們都是緊脹着臉在街上跑來跑去，只要四叉路口綠燈一亮，就急急忙忙地穿過人行道，擠着走進車站，或者跳上電車，公共汽車，就像螞蟻般成羣結隊地活動着。在工廠裏，我也從來不會看見一個工人，不論是男的或是女的，當參觀者走過時會抬起頭來看一看，所有一切的人都是埋頭在他們的工作中間了。至於那些工作的位置稍爲緊要一些的人，那就更是忙得連吃飯，睡覺的時間都沒有。我從來不會像在莫斯科那樣地看到那麼多對於工作不感疲倦，勤勞有爲的人。而且在另一方面，我還非常的爲這些人擔憂，因爲他們的過度工作已經使得他們

得到了惡影響。真的，他們是完全爲他們的工作所消磨了，差不多大部份莫斯科的人民，地位緊要一些的，看上去都比他們的年齡要老了很多，美國式的那種匆忙，我不曾在紐約與芝加哥發現，却在莫斯科發現了。

對於這種說俄國人是懶散的話，是必須加以堅決的否認的。一個在二十年前還是充滿了貧窮，污穢，以及無知的國家，今天却已經有了高度發展的工業，一個合理的農業制度，無數新造或者全部改造過的城市，而且還全部鏟除了文盲。對於一個如果是天生懶散的國家，我們能夠相信有這樣的許多事情可以做成麼？即使說蘇聯是幸而有了那麼許多有無比才能的領袖，但恐怕今天世界所有一切的天才都集中在莫斯科，只要人民真是天生的懶惰的話，也決不可能有這麼許多偉大的成就的。其實，這一點也沒有什麼希奇的，因爲當工農們在給資本家，以及大地主剝削的時候，他們感覺到做工對於他們完全是一種難以忍受的負擔，因此當然總是想愈少做愈好。可是今天這樣的情形是完全改變過來了，因爲

他們已經明白正是他們自己是得到這些工作的好處的。安特列·紀德同時還奇怪——在這一點上有許多人是與他同意的——那就是在蘇聯，各人所得的薪水並不相等。我對了他們這個奇怪倒真是感到非常奇怪。因為在我看來，如果蘇聯今天還不能真將共產主義的理想『各取所需』實行的話，那麼實行『各取其應所得』的口號是完全合理的。社會主義決不是一個要使得大家平均窮苦的主義而是一個要使得大家平均富有的主義。但我就不知道如果要強迫那些收入多的人也變成收入少的人，怎麼就能夠達到平均富有的目的。如果說只要社會主義社會中的人民還並不能全部生活得舒適的時候，因此他們就必須全部生活得不舒適，這在我看來實在是有些近於原始基督徒的觀點，是不大正確的。在堅持這種觀點的人中，使我想起了一位我的親戚來，他是一位年老的保加利亞行政官，他在大戰的時候總是睡在光光的鋪板上，因為在戰壕的外邊不知有多少人在沒有床睡。

至於恐懼這種收入不相等，會使已經鏟除了的階級觀念重新復活，這在我看

來，也是不對的。一個真正沒有階級的社會的基礎顯然是建築在要使每一個人都能一生下來就得到同等的教育機會以及職業機會，使每一個人都能確定地受了教育之後即依照了他或她的能力找到工作。而這一個原則，在蘇聯是無疑地在實行的。我在莫斯科從來不曾看到過有身份觀念的事情發生過。同志這兩個字決不是空的。當木匠同志從地下爬上來的時候，他的確感到他與人民委員會裏面的同志有着同等的地位。在西方，從我所看見的事情來說，農民或者工人無產者的子女們如果是想求得一點高級的教育的話，就深深地感到他們是在向上層階級爬，因此是企圖着與原來的同志離得很遠遠的。在蘇聯，則剛巧相反，農民以及無產者的智識份子總與他所生長的工人羣衆保持着最密切的關係。

此外還有一種批評那就是說蘇聯的人民是被奪取了個人的特殊性的，他們的生活方式與意見都是標準化了，屬於同一的法律，完全變成一致的。照紀德的話

說起來：那就是：『如果您與一個俄國人談過了話，就等於您和所有的俄國人都說過話了』。

在這個說話裏，是含有着一點真理的。因為不但在許多關於日常的消費品方面，經濟計劃上規定有某種程度的標準化，即整個蘇維埃人民的公共生活也是完全標準化了的。開會，政治演說，辯論，以及俱樂部生活都完全差不多，而政治上所用的一切名詞也在這整個國家中完全統一的。

如果我們對這種『一律主義』作進一步的考察的話，那麼這種『一律主義』很顯明的是表現在三方面：對於共產主義的基本原則大家的意見是一律的，對於蘇聯的愛好，大家是一律的，還有對於那種在最近將來，蘇聯即將變成世界上最快樂最有力的國家這個信仰上也是大家一律的。

所以第一件事，大家所公認的，那就是生產手段應當屬之於公有而不應當屬之於私有。我看不出對於這件事，大家意見一律，有什麼不好的地方。事實上，

這件事我覺得是並不如大家都承認兩件東西如果同等於一件另外的東西的時候，那麼這兩件東西的本身也必彼此相等有什麼不好的地方。同樣，我對於蘇維埃人民的愛好他們自己的國家，雖然他們所採取的方式有時候總是相同而且非常天真的，也想不出有什麼可以攻擊的地方。老實說，我對於他們那種孩子般的愛國熱誠倒是非常歡喜的。蘇聯還是一個年輕的國家，它經過了很多的犧牲之後，終於有了今天的這些偉大的成績。他當然是有理由對於這些成績感到得意的。

至於倘說這種蘇維埃的愛國主義，排斥着一切批評，這是完全不對的。所謂『布爾希維克的自我批判』，是決不是一句空話，而是確實執行的。我們可以在蘇聯的報紙上看到很多對於各方面激烈批評的文字，在會場上開會時也往往有人提出許多批評的意見來，此外我還曾經很驚異地看到過許多攻擊有了錯誤的工作者的諷刺畫。在蘇聯即使是外國人也並不被禁止發表他們的坦白意見的，我不是已經講過，蘇聯的國家報紙，就不但不會將我的文章審查了才發表，而且當有幾

次，我批評着某幾方面的不寬宏，與過份的崇拜史太林，以及要求着對於政治犯審判時作更多的說明時，他們也是完全照了我的文章原樣刊出的麼？我所遇到的那許多重要領袖也都是毫無例外地歡迎着批評甚於稱讚的。他們歡喜與西方各國比較着估計他們自己的成就，他們這種估計都是很正確的，而如果他們自己的工作有的時候真感到不如西方的時候，他們也決不會遲疑着不承認的。真的，他們甚至有時候常過分地高估西方各國的成就以顯出他們自己的不良。不過，如果當一個外國人太過分的吹毛求疵，將那些不重要的小缺點來抹煞了他們整個事業的價值的時候，那麼蘇聯的人民馬上就要變成不能忍受了，那種空虛的假恭維，他們是決不接受的。（紀德那本反對蘇聯的書，爲什麼遭受了蘇聯人民的強烈惡感，主要可說是因爲他在蘇聯境內的時候除了稱讚，一點也不說什麼，但當他一離開蘇聯邊境的時候，却就大大地提出了他的批評來。）

不過，我們在蘇聯即使隨處都可讀到與聽到很多對於各方面的批評，對於

『黨的整個原則』却是從來不曾聽到有人批評的。在這一點上，蘇聯人民可說又是『一律』的。但什麼是『黨的原則』呢？凡是黨的一切設施可說都是從對於蘇聯的建設是根本成功，以及在未來戰爭中決不會失敗這個信念出發的。因此，在這一點上，我也同樣地不明白爲什麼大家就不能一律。因爲自從一九三五年以後，因了蘇聯國富的增加，以及紅軍的強盛，一切過去對於這個原則所還可能發生的懷疑，已經是一掃而光，大家現在的對於這個原則同意，正等於對於一些常識的大家同意一樣了。

總之，蘇聯人民的『一律主義』實在就是他們對於祖國的一種深深的愛好。在其他各處，這種情形，都是被稱着愛國主義的。譬如，在英國，當足球就賽得非常激烈時，只要國歌一唱大家就變成非常和睦了，可是我們却很少將這稱爲英國的一律主義。

在蘇聯人民的愛國主義與別國人民的愛國主義之間有一點不同的那就是蘇聯

的愛國主義是有着一個更合理的基礎。在蘇聯，各個人民的生活標準是很顯然地在一天天地提高着。這不但因為蘇聯人民所收入的盧布是在增加，即他的盧布的購買力也在提高。在一九三六年，蘇聯工人的平均工資就已經比了一九二九年增加了百分之二百七十八，而且蘇聯人民是很高興地知道在未來許多年中這個趨勢是還要繼續的。（德國的金準備已經跌到了五百萬鎊，而蘇聯的金準備則已經增加到了一百四十六萬萬鎊）對於一個愛國者如果他既能得到槍砲，又能得到牛油，當然一定會比了他只能得到槍砲而不能得到牛油是更容易於愛國些。

不過在蘇聯現在也確還有一種大家都一致的樂觀主義存在着，這種標準化了的樂觀主義，對於文學以及戲劇有着一些妨礙，因為這兩種東西，原是在形成個性這件事情上有着很重要的任務的。

現在我且將蘇聯的文藝以及戲劇的情形來說一說：

我已經指出過蘇聯使廣大人民都受教育以及將許多過去廢棄不用的人才現在

都已啓發培養出來的事實。

一切學者，作家，藝術家，以及演員在蘇聯是都享有着很多的利益的。他們是爲國家所賞鑑着，鼓勵着，甚至可說是驕養着，不但有很多的特權而且還有大量的收入。一切他們所需要用的東西是都可以聽他們的支配，並且沒有一個人是需要焦急到底他所做的工作會不會得到報酬。此外，並且他們在全世界可說是還有着羣最負責最感到深切需要的觀衆。

對於蘇聯人民的那種飢渴着要求讀物的情形，我真是覺得難以形容，他們讀着很多的報紙，期刊，以及書籍，可是還一點也不能滿足他們的胃口。對於這件事情，我可以舉一個例子，那就是當我去參觀真理報的印刷局的時候，這是一個在莫斯科銷路最大的報紙，我們環繞了那架巨大的輪轉機走，這機器在印刷機中恐怕要算是最大的了，能在兩小時之內印兩百萬份。在外形上，這機器，就簡直像一架巨大的火車頭，而當一個人環繞了那有八十五碼長的機器台上走的時候，

就簡直有些像在大輪船的甲板上走。可是當我用了十五分鐘時間走了一圈之後，我發現那機器在那機器房中間還只佔着一半地位，那另外一半地位是空着的。我就問這事情的理由，而我所得到的回答是：『我們現在所印的真理報數是兩百萬份，可是我們所有的訂戶數却是五百萬份，所以我們是只要一等到紙廠方面有充份的紙可以供給我們的時候，我們立刻就再要架設起另外一部機器來的』。

那些名作家的書籍出版數也是這樣。普希金的著作到一九三六年年底的時候，就已經銷數超過了三千一百萬份，馬克思列寧的書當然銷數是更大了。這些名作家的書的銷數，現在可說是就只因爲紙張缺乏，所以限制了銷數。在平常的日子，這些作家的書是決不能在任何書店或者圖書館內找到的。如果有一個新的版本出來了，那麼買的人就一定要在店門口，排起了隊伍才能買到，而出版的數目即使是兩萬本，五萬本或者甚至十萬本，也可以在幾小時之內就賣完的。在幾個主要的圖書館內，有七萬種名作家的書，在幾星期以前，就已經預定去了。所

以在蘇聯，書籍雖然便宜，可仍是很珍貴的東西。我有一次當人家告訴我我可以將我的錢放在外邊，而我的書則一定要鎖了收藏起來的時候真還以為是一個笑話。那些有名作家的書同時也還譯成蘇聯境內的各種民族語言，所以一個作家的讀者，有的時候，竟是那作家連對於那讀者的民族名稱說不出來的也有。

我已經講起過蘇聯的讀者比了別的國家的讀者更多對於書本認真的情形。所以對於蘇聯的讀者，書中的人物也就有着更高度的真實性。一個小說中的主人翁是必須有着真正存在在蘇聯社會中的人物的性格的。如果有一次有一個作家，受到了讀者的歡迎，那麼他就一定會像在別國的电影明星，或者拳擊家一樣的受到大眾的歡迎。而羣衆對於他的信賴也就正像虔誠的天主教徒對於他們神父的信賴一樣。

哲學書，在蘇聯也同樣地受到歡迎。一種康德著作的新版本，十萬冊只要一下子就可以賣完了。蘇聯人民是用着討論對於他們日常生活有關的經濟問題時同

樣的熱誠對於一個死去哲學家的學說加以辯論的，同時他們對於歷史上的人物也一定要討論得非常清楚，正像他們討論人民委員會中的委員一樣。蘇聯人民拋棄了一切與他們實生活無關的事情；但只要有一件事情他們在那裏面發現了與他們的實生活是有關的，那就一定會立刻更生動地將它實行起來。蘇聯人民的所謂『遺產』，是完全非常實際的。

在戲劇藝術方面的情形，也正與文學方面的情形一樣。

在莫斯科有着三十八個大戲院，以及無數的俱樂部與變相劇場，一大批的新戲院還正在建造着；這許多戲院是差不多天天客滿的，因此要買到票子真不是一件容易事情。例如莫斯科藝術劇場，據說自開幕以來，就不曾有一天有過一只空座，觀眾坐在劇台或者銀幕的面前，他就一心一意地欣賞着這些戲劇，劇本的每一個微妙的動作，這些觀眾是可說都能夠領略的。

因此，很明顯的，對於蘇聯的作家以及劇人，可說是真有着一羣理想的觀

衆，同時他們又受着國家的最大支持，照例原是應當有一無缺點的工作成績做出來的，可是不幸，他們就正受着我所已經講過的那種一致的樂觀主義的損害。

在今天，蘇聯人民的生活中間，正充滿着一種英雄的狂熱，這當然必然會使一切的藝術家們受到影響的。從法西斯巨頭那邊傳來的戰爭威脅現在已使一切作家們以及藝術家們的心理發生了這樣一種影響，那就是他們已差不多就將那種英勇的樂觀主義作爲他們一切創作的動機了。不過，我同時還不相信如果當局方面沒有一種提倡，像這種充滿了樂觀主義的書籍，劇本，電影，就會有那麼多的數量出現。譬如有一次有一個很有名的小說家寫了一篇小說描寫一個飛行員怎樣在創造了一種新紀錄之後就失事了，可是當那作家的作品出集子的時候，這篇東西就被刪去，因爲據說是太『悲觀』了。

這種努力着不與一般的樂觀主義的原則相脫離的企圖，在劇本方面的情形是比了書籍方面的情形更來得利害，但最利害的還是電影。在這一方面，當局是可

說是用着一切企圖不使作家與那個原則相脫離的。

不用說，這種英雄的樂觀主義，當然也會出產了相當數量的傑作的。如維斯契奈符斯基(Vischnevsky)的電影克朗斯帶特海軍，阿菲諾蓋諾夫(Afinogenov)的劇本距離，以及契新斯基(Dchersinsky)的靜靜的頓河等。但大部份的作品是因了那種一律的作風而變得平淡了。

在莫斯科的劇壇上，現在就只有古典劇是不曾受着那種樂觀主義的支配。當我在莫斯科的期間，沙士比亞的劇本排演的共有八種，此外還有席納的，果戈理的，托爾斯泰的以及高爾基的。都排演得非常之好。所以在莫斯科有人曾說：『一個作家，如果要想他的非政治色彩的劇本得到排演的機會，假如他不是高爾基的話，那麼，就得至少死去了五十年』。在這個笑話中間是帶着一點苦意的。

不過，像這樣的情形，也並不是一直這樣的。在前幾年，莫斯科的舞台與電影上的範圍就還要大一些。如果有人去問那些負責人為什麼在這最近一兩年來，

文學上的或者藝術上的出品要這樣比先前嚴格地受到限制，那麼他一定就會得到這樣的回答，那就是蘇聯現在是正在立即要去從事戰爭的威脅之下，所以精神上的動員是決不能忽略的。這就是任何人在蘇聯對於許多旁的問題所可能得到的一種答覆，而這同時也就解釋了許多在蘇聯之外很難瞭解的事情。



### 第三章 民主與獨裁

現在我們要講到在討論一九三七年的莫斯科時，最容易引起爭辯的一個問題了。那就是在蘇聯，到底所謂『自由』是怎麼一會事？

您如果用了這個題目去與蘇聯的人民討論，那麼他們一定會堅持只有他們是有着真正的民主，旁的國家所有的民主是完全只是形式的。他們會問，如果說所謂民主是人民去管理政府的意思的話，那麼人民如果並不會佔有生產工具，他又怎麼能去管理政府呢？在所謂民主的國家裏，他們說，人民是只在名義上管理着政府，而並不是在實際上管理着政府，真正的權力是完全操縱在那些佔有生產工具的人的手裏的。因此，他們又進一步的問道：如果嚴格地審查起來，一般國家中的所謂民主自由又是怎麼一個東西呢？還不等於就是使人民能夠公然的發表一

些對政府的無關緊要的抗議，以及能在一只小箱子裏每隔三四年投一張票。至於這些『民主自由權』，是一點也沒有什麼方法可以給與廣大人民意志的實現以一種保證或者可能的，除非人民能夠控制言論，出版，集會，否則就是所謂言論，出版，集會的自由一定都完全是空的。可是在現世界又有那些人民是真正控制了這些東西的呢？在那些地方人民是真能有效地表示了他的意見，以及有效地找到了他們的代表的呢？惠瑪憲法是被稱爲世界上最自由的一種憲法的。可是依照了這個憲法而選舉產生的國會是不是就能表示人民的意志呢？是不是就能阻止法西斯蒂少數人的專政了呢？因此，蘇聯的人民結論說人民的真正自由是只能在生產手段爲公共所有的時候才可能，而如果人民還不會能得到這種的自由時，那麼一切所謂民主的自由就都完全是假的。

在我自己說起來，那麼，我必須承認，我也就是曾經生長在這種所謂民主國家裏面過的人。我對於那些所謂民主國家裏的民主權利，起初很信仰，隨後也就

發生懷疑了，我最初對『民主』失掉信仰，是在世界大戰的時候，因為那時候我感到雖然說是民主，可是戰爭仍還是在違背了最大多數人類的意志而在進行着。以後一年又一年，在普通所謂民主憲法中的缺陷對我就愈來愈清楚了，因此在今日我也就傾向於這種意見，那就是說一般所謂憲法上的民主權利事實上都只是一種使得少數人的意志因此能夠實現的引誘物而已。

至於蘇聯，那倒確是，我相信，是在向着社會主義民主制的道路上前進。在蘇聯，現在佔有生產工具的已經不是個人而是人民這件事，已經是一個明顯的事實。同時一般的所謂民主國家，因了他們的空談裁軍，以及不斷的妥協，鼓勵了法西斯國家的侵略，而只有蘇聯倒是在真正阻止着法西斯的勢力，這也是一個事實。所以不但蘇聯領袖們所說的那種諷刺話只有他們的『非民主的辦法』才是真正使得西歐的『民主』可能存在的力量的話是對的，並且他們還確曾創造了一種真正的民主制，在那民主制裏，他們已將生產手段的所有權移向公衆，並且建

立起了一種爲保衛這種民主而必須有的武力。

蘇聯的敵人常常歡喜中傷蘇聯說列寧曾經有過一句話：『自由是一種資產階級的偏見』。所以在蘇聯是不會有自由的。可是事實上列寧這句話的意思是正與他們所說的意思完全相反的。列寧所要指出的只是那種資產階級對於自由的歪曲意義。他說：『只要階級不取消，那麼所有關於自由，平等的談論都完全是自欺欺人的。只要生產手段的所有權問題還不會解決，那麼在人類社會間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與真正的平等而只可能有一種有產者的階級自由以及一種存在在有產者與無產者之間，吃飽的與飢餓者之間，剝削者與被剝削者之間的假平等而已』。

這種對於自由的概念，現在已變成蘇聯公民的一種真理。那種存在在一般所謂民主國家裏的，能夠對於政府提出些無關緊要的抗議的自由，雖然也許好，但在蘇聯的人民看來，無疑的，沒有了失業，沒有了老年時的貧苦，以及沒有了對

於未來子女担心的自由是更來得好些。

史太林有一次對於斯泰哈諾夫運動的工人演說：就曾說到：『如果沒有了麵包，沒有了牛油與脂肪，沒有了製衣服的材料，沒有了很好的住所，那麼單有自由是一點也沒有什麼用處的。同志們，我們是很難單單依靠自由而生活的。爲了要能好好地而且快樂地生活，政治上的一切自由是必須有物質上的東西來給以補充的。』

在蘇聯憲法的一百二十五條上，並且還有着下列的規定：『爲顧及一切職工利益及鞏固社會主義制度計，人民依法有下列之權（a）言論自由，（b）出版自由，（c）集會及結社自由，（d）遊行示威自由。此等權利以印刷機，紙張，公共建築，街道，郵政電訊以及其他一切爲實行此等權利而必須有之物質條件全部均置於職工及其組織之管理之下爲實行之保證』。這一條條文，很顯明的，也與其他各國憲法中規定言論以及出版自由的條文不同；因爲它同時還提供

着給與這些自由的保證。

不過雖然是這樣，在目前，我們也還不能認爲蘇聯的民主就是最理想的。這是因爲一直到今天爲止，蘇聯離開她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最終點還有着相當距離而不能一下子就超過去的緣故。蘇聯如果現在也採取了像目前西歐所採取的那種對於民主的概念，那她根本就不可能完成她今天所已經完成的事業了。可是就因爲這個原故，許多人却就此說蘇聯是與民主制度相反的，而且，甚至說在蘇聯與法西斯專政之間沒有什麼不同。這般人的盲目真是非常可憐的。因爲歸根結底所謂蘇維埃的專政只是限制着兩種意見不許發表：一種是說在蘇聯建設社會主義如果沒有一個世界革命是決不可能的。還有一種是說蘇聯，在未來戰爭中一定要失敗的。在我看來，任何人如果從這兩種禁止中得出了什麼與法西斯專政有相同的情形來的話，那麼他一定忽略了一個主要的不同，那就是蘇聯所禁止的只是不准人家去說二加二等於五，可是法西斯專政所禁止的却是不准人家去說二加二等於

四。

嚴格地說起來，蘇聯人民當然也是願意除去一切今天還留在他們公共生活中間的缺點的。這從他們的接受憲法等方面可以看出來。不過，蘇聯人民是很小心謹慎的，正像他們知道必須先有了足夠的原料與機械的生產，然後才談得到生產日用消費品一樣，他們知道一個人要充分享用在社會主義民主制度下的權利，是必須先使這種民主制度因勝利或者消除了戰爭危機而變成穩固後才有可能的。我有一次與一位蘇聯的領袖談話，談到現有社會主義民主制度下的各種小缺點時，他就這樣對我說，『我們現在還正像一隊在戰鬥中的軍隊。我們必須首先取得了勝利，然後其次我們才談得到到底我們制服上的鈕扣應該放得上一些，還是放得下一些。』

這個譬喻，我想是非常確當的。

但在蘇聯，另外也還有一種事實使得許多人誤會蘇聯是獨裁的，那就是蘇聯

人民那種太過度的對於史太林的崇拜。

真的，蘇聯人民的那種過分的對於史太林的崇拜可說是使得外國人到蘇聯去訪問的第一個最顯著可以得到的印象。在蘇聯的任何一處，不管是在合適的地方或者是不合適的地方，我們總能看到很多史太林的巨大的半身畫像。任何演說，只要我們有機會能夠聽到的，不論所說的是政治或是關於藝術以及科學的題目，也都要插入着很多對於史太林的稱讚的說話，而且這種崇拜還常常是採取着許多不使人歡迎的形式。

當然無疑的，在大部份這種崇拜史太林的表示中是確有着理由的。因為人民確是感到需要要表示一下他們的感激，他們的無限讚揚，他們這樣做是因為他們確是相信着他們從史太林那裏得到了一切。所以雖然有的時候，在我們西方人看來，好像那種崇拜的形式不十分合式，可是我從來不曾發現過在那裏面有什麼做作或者作假的地方，這種崇拜是完全與經濟建設的結果不可分開的一起有機地

生長起來的。人民對於史太林喜歡是因爲他給與了他們麵包，肉類，秩序，教育，並且還創造出了紅軍來保衛他們的利益。對於這種物質環境的改進，蘇聯人民，覺得總一定要對什麼人表示一下感激才對，而在這種情形下，抽象的東西是不夠的，他們決不會對一個抽象的『共產主義』表示感激，而只會對一個實際的人表示他們的感激，而那個人就是史太林。所以當人民提及史太林的時候，在他們的心目中，實在就是整個在繼續增長中的繁榮與繼續增長中的文化。而當人民說：『我們擁護史太林』的時候，實在也就因爲這是他們對於經濟制度，社會主義，蘇聯統治願意表示擁護時，所可以用的最簡單而最自然的表示方式的緣故。

此外，史太林也確是真正人民的代表。他是農民鞋匠的兒子，所以他還保持着那種工人以及農民的傳統。對於他，在我知道的一切政治家中，他是真正可以說是說着人民的語言的。他是絕對不是一個我們所能夠稱之爲演說家的人。他說話非常遲疑，而且也沒有什麼音調，就像他是有着什麼困難般的。他的論證，也

表示得非常慢。同時這些論證，都只訴之於人民的普通常識，因為這些人民瞭解一件事情的時候，也常常是很根本的去瞭解它，而決不是很快的就去瞭解它的。不過，史太林也有着一種幽默，一種輕快，可是却帶些冷酷的農民的幽默。在他的演說中，他常常喜歡從那些通俗的俄國作家的書中引證出很多的故事來，他對於這些故事完全欣賞着，而且能指出它的實際意義來的。在某些部份，他的演說詞讀去時就有些像舊式曆本上的說話。而當史太林演說的時候他也總是很舒適地笑着，用手指指着，他是決不像其他的演說家那樣的在他自己與聽衆之間劃出一條界線，他站在台上命令般地演說而聽衆則在台下聽着，他是很快地就能在他自己與聽衆之間造出一種同志，親密之感來的。他們是屬於同一階級的人，因此當然容易對於論題發生興趣，對於同一的簡單故事彼此很快樂地笑起來。

除了這些以外，史太林與別的統治者不同的是他的特別來得不肯顯露。他並不會接受什麼大的銜頭，而只簡單的被稱爲「中央委員會書記」。他除非十二分

必要也決不在羣衆面前出現。譬如當莫斯科紅場中舉行對於接受憲法（這個憲法通常是就叫作史太林憲法的，）的大慶祝會的時候，他就不會去參加。關於他的私生活很少是有傳入到公衆的耳朵中去的。雖然在外間有很多關於他的傳說，說他怎樣關心着一切個人，如他怎樣爲了救一個垂危的小孩特別派一架飛機帶了藥物到中央亞細亞去，以及怎樣強迫一個退休了的作家去住良好的住宅等等，可是這些傳說雖然傳來傳去，却只有極少數的幾個能夠在報紙上發表出來。關於史太林的私人生活，他的家庭，他的習慣差不多還是沒有什麼確定的事情可以知道的。他決不願意讓大家來慶祝他的生日，而如果有什麼對於他的慶賀在大衆之前舉行的時候，他也一定力說這種慶賀是爲了他的政策而決不是爲了他的個人。譬如，當大會通過憲法，並且對担任起草的他表示歡呼的時候，他就自己也加入拍手，表示他的接受這種慶賀完全是爲了他的政策而並不是爲了他的個人。

在我所認識的那些有權力的人中間，史太林確是要稱是最不自負的。我很坦

白地與他談到那種對於他的過度的崇拜事情的時候，他也用着同樣坦白的態度對我回答着。他抱怨他的事情太忙，實在沒有時間再來注意到那些無聊的，不必要的酬應，平均起來，他收到一百封對於他的祝賀的電報時，他往往只回答一封。他自己個人是極端客觀，差不多接近無禮的地步，因此他也歡迎着與他談話的人能夠有同樣的客觀。

當他知道許多人對於他個人的過分崇拜時，他最先聳了聳他的肩膀。當我再指出許多地方對於他的胡亂給與讚揚的事情時，他忽然變得嚴肅起來了。他想那是可能有什麼『破壞者』躲在這些事情的後面想企圖來破壞他的。『一個諂媚的傢伙』，他說，『是遠比了一百個仇人還要來得有害』。但他解釋說他的爲什麼放任所有的人對於他的歡迎是完全爲了他是知道這些人民當這樣做時所能得到的那種天真的快樂，以及他的深知這麼做決不是僅僅爲了他的個人，而是爲了他的代表着在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經濟遠比永久革命來得重要的那種主義的緣故。

不過，在這不久之後，在莫斯科以及在列寧格勒的黨委員會終於通過了一個決議案，不准『對於黨的領袖們作不必要或者無意義的致敬了』。而那些像潮水般的祝賀電報，也就開始在新聞紙上消失。

總之，史太林所給與蘇聯的新憲法是決不是像在什麼展覽會中的東西給人看了看就可以算的。在目前，雖然史太林及他的幫助者所用的方式還有些模糊，但就是史太林自己也不會就認為成功。他是很坦白的承認將實現社會主義的民主制度作為他的最後目標的。



## 第四章 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

『因種族關係而對於人民之權利有所限制，或有所增益，不論直接，間接，均與傳播種族之排他思想，或種族間之互相仇恨，一律爲法律所禁止』。——在蘇聯憲法的一百二十二條上是這樣寫着的。

憲法第二章，標題作『國家之建立』下，並列舉了許多的民族名稱，而任何人只要看到過莫斯科國會中那許多從喬其亞，通柯瑪尼亞，烏茲貝克，吉爾其茲，塔契克，卡爾瑪克，雅各脫地方來的人也一定會感到將這許多人都在槌子與鐮刀的國旗下面團結起來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蘇聯，也確有過一個民族問題不會得到解決的時期的，可是現在已經完全解決了，而且民族主義的可能與國際主義合併起來也在蘇聯得到了一個證明。

當在一九二四年的時候，史太林就認識而且宣稱俄國的農民是在他的本身有着實現社會主義的可能性的。換句話說，就是可能是民族性的，同時又是國際性的。史太林的敵人，就嘲笑他並且說他是一個烏托邦主義者，可是今天事實已經證明史太林的理解是正確的：從白俄羅斯一直到遠東的農民是已經都給社會主義化了。蘇維埃人民愛護他們的國家並不比法西斯蒂們的愛護他們的國家，有什麼不如的地方，不過，那是一種對於蘇維埃國家的愛護——換句話說就是它的基礎並不僅僅只建築在神秘的下意識上，而是用理智的水門汀所鞏固起來了的。史太林這個偉大的實際心理家，是已經將各民族人民的愛國熱誠都在國際社會主義的目標下動員起來了。所以今天即使是遙遠的西伯利亞地方的人民對於德義的進攻西班牙也都感到無限的憤怒，就像他們自身受到了攻擊一樣。在蘇聯的每一家人家房屋內都掛着西班牙的地圖，我並且知道在莫斯科附近的農民願意停止了他們的工作或者飲食，爲了跑到會議場上去聽無線電報告西班牙的消息。所以即使在

村莊的居民中也已經證明可能，不管他們的民族主義是怎樣喚起了一種國際友誼的感覺。

史太林的公式，『民族的形式，國際的內容』，在今天已經變成了事實。同一的社會主義已被各種在蘇聯的語言用各種形式所使用着。在形式上是民族的，可是在實質上是國際的。各自治邦的民族特點都被好好地發揚着——不論是語言，藝術，以及任何種的民俗。那些一直到現在為止還只有語言而沒有文字的民族也被給與了文字與字母。任何各處都有着民族的博物院，將民族的傳說作研究的機關以及高級的各種民族歌劇院與戲院。

對於蘇聯民族政策的到底如何良好以及有效，我從她的解決了從古以來一直認為最難解決的猶太問題中，可以最清楚的看出。沙皇時代的一個閣員勃蘭付，曾經說過，他對於猶太問題除了想強迫他們三分之一的人去改籍，三分之一人出境，以及三分之一的人去死之外再沒有另外的辦法。可是蘇聯現在是有了另外的

一個辦法了，她已經同化了五百萬猶太人中間的最大部份，同時給了餘留下的那一部份人一個廣大的自治區域，以及去到那裏生活的辦法。因此蘇聯就給她自己創造出了幾百萬活動而又聰敏的公民，他們都是狂熱地忠於這個國家的。

在蘇聯我曾碰到了各色各種的猶太人，因為我的喜歡猶太問題，所以我都與他們很熱心地討論各種問題。蘇聯生產的急速進展，使各方面都需要人手，猶太人又願意去從事工作，所以在蘇聯對於猶太人的同化作用比了別處更加快。我曾碰到了一個猶太人他對我說：「有許多年，我都不曾想到過我自己是一個猶太人的事實了；倒是你的問題才使我記起了它」。我是很為我所碰到的猶太人對於蘇聯所感到的那種完全感到一致與和穆的精神所感動的。在這以前，他們都是被歧視，被虐待，連姓名都沒有，生活得毫無意義，僅僅只是『影子』般的人物，可是現在他們都是農民，工人，智識份子，軍人，對這個新國家都深深地感到喜歡的人物了。

對於這些久被逼迫着離開了土地的猶太人現在忽又重新能夠使他自己有土地耕種了，因此所感到的喜歡，當然是很明顯的。有好多次猶太人集體農場的代表都跑來請我去看他們的地方。不過，我所更感到興趣的倒是去聽那些非猶太人的蘇維埃農民怎樣說及這些猶太人，因為我是料想在這裏如果有什麼反對塞米族的表示的話一定會有所洩露的。可是我所得到的結果却是這樣：雖然在最初，這些非猶太人的蘇維埃農民也確實同樣也有着對於猶太人性格的偏見，認為猶太人至少對於耕種是完全不適合的，可是他們現在却不能不對他們的早期的偏見自己也感到可笑了。在烏克蘭，在克里米亞，以及在頓河區域，據我所知，在猶太人與非猶太人地方之間是常常舉行着各種友誼的競賽的，在頓河區的高加索人並且告訴我猶太人不但在農業競爭上戰勝了他們，使得他們克服了先前的偏見並且還證明了猶太人同時是非常好的會騎馬的人。

對於這些經過了幾百年的痛苦不能得到智識與教育的猶太人現在忽然能夠得

到機會去受教育，當然也是非常地感到喜歡的。有人會告訴我在猶太人的村莊中，年齡從十五歲到五十歲之間的人，不論男女，特別感到稀少。那緣故就因為整個的猶太青年都跑到市鎮上去學習了。

蘇維埃猶太人的民族主義是用着一種嚴肅的熱情表示着的，有兩件事實可以說明它的非羅曼諦克的，實際的而且是勇敢的性質。第一件事就是他們的語言，蘇維埃猶太人認為那種高貴的希伯來文雖然充滿了典故，可是却不合需要，只有伊特語，雖是有些不調和的因素在內但是它是從日常生活中生長起來的，所以就被現在至少有五百萬人作為一種實用的通俗語言使用着了。第二件事那就是現在猶太人已經有了一塊土地可以給他建立他們自己的國家，而在那裏他們也已經住下——那地方雖然遠一些，而且有些困難，可是却是充滿着希望的。

伊特語在蘇聯，也正像別的語言一樣受着培植。有着伊特語的學校，伊特語的報紙，也有着伊特語的文學。爲了改良語言，還會特別召集了各種大會，而

猶太的劇院則受到了最大利益。我曾在一個莫斯科的猶太國家劇院中看到一次過非常好的莎士比亞名劇李爾王的演出。有着名角擔任主角，一切的佈景等等也都非常的好。

至於建立比羅比莊的猶太國家，這事在最初也曾經遭遇了差不多不可克服的困難，同時這個計劃是被蘇聯的反對者看作要在一個國家之內建立起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來一樣的輕率與無望的事業的。

可是今天，您如果跑到比羅比莊地方去，您一定會覺得那是一個極好的有着學校，醫院，政府建築以及戲院的城鎮了。而且您可以從莫斯科坐了頭等快車去。雖然依據移民的計劃，在今後的三年中，可以有十萬猶太人移去，可是當局還不得不維持着嚴格的限制，因為要去的人實在太多了。我曾從比羅比莊那裏收到過很多的信，並且與很多從那邊來的人說過話。在比羅比莊的生活仍是非常困苦道事，是沒有人否認的。可是也沒有人否認那最困難的一部份工作現在是已

經完成了。烏托邦是已經變成事實了。

比羅比莊的猶太社會主義共和國是成立了。

## 第五章 戰爭與和平

在全世界現在是都在談論着戰爭了，那個『什麼時候您以為戰爭就會爆發呢？』的問題現在也已經成了各種談話的中心。不過，雖然每一個人現在已都想到了未來戰爭的事情，在西方，除了法西斯蒂國家內的人民外，還沒有一個人真正將這問題嚴重的考慮過。正同一個人繼續着生活而且作各種打算，從來不曾嚴重地考慮到他自己的死一樣，雖然那是必然的。在蘇聯，每一個人都認為未來的戰爭是有着百分之百的可能性的。蘇聯的人民說，就是因為他們自身的存在，而且一天天地在變成繁榮，很明顯地否定了一切法西斯蒂的理論，因此法西斯蒂的國家如果他們自身企圖要存在的話，就必須摧毀我們。正像那些用了原始的工具，依賴他們自己的技藝而生活的人，因為他們自身的感到受機器的威脅，便圍

結起來對機器作無意義的打擊一樣，法西斯蒂的國家也同樣地要這樣來打擊我們的。而且那些領袖們雖然也明知道要發動一個打擊我們的戰爭，他們的自身就必然會因此崩潰，可是他們還是非從事這個戰爭不可的。他們自身所創造出來的那種經濟危機，會逼迫着他們最後非這樣做不可。一個政府，譬如像德國的政府是不可能剝奪了人民的牛油與脂肪，甚至日甚一日的剝奪去人民的食物，人民的一切日用必需品，而答應着他們人民去製造鎗砲，而最後只將這些鎗砲作為展覽品而不去發動戰爭的。

真的，一個普通蘇聯人民對於法西斯主義者所形成的概念是很難加以形容的。在他看來，希脫勒的，莫索里尼的，以及佛郎哥的手下人簡直完全都是些原始的野蠻人，雖然有着近代的技術武裝，可是卻一點也沒有對於文明的概念。而且他以為，法西斯主義者，是正相反，從文明中發現了他們的最危險的敵人，因此在此計劃着要鏟除去作為這種敵對文明代表的蘇聯人民的。在德國的法西斯主義

者中間，有一句說話，那是印在德國官廳日曆上的一句說話，曾經使得蘇聯人民特別受到振動的，那句話就是：『一個真正的德國人，是永遠不能作爲一個智識份子的』。因爲要作爲一個智識份子恰巧是每一個蘇聯人民，農民，工人，兵士們的理想目標，因此，蘇聯的人民當然必然地會將德國的法西主義者目爲這種敵對主義的具體代表了。他們對於德國的法西主義者倒也不一定是完全的憎恨，而是可以說是一種近乎人對於某種可怕的有毒害蟲所起的反應一樣的感情。

蘇聯現在整個收入中的六分之一是作爲防禦這些法西斯主義者的進攻費用而支出的，這當然是一個巨大的支出。蘇聯的人民瞭解得很清楚，那許多今天使得蘇聯的生活比了西方各國的生活困苦的缺陷是只要那六分之一的支出作爲了他們自己使用的錢時是一定馬上就可將這些缺陷除去的，每一個人也一定可以穿得比現在好一些，住得比現在好一些。可是蘇聯的人民同時也知道得很清楚，那些不懷好意的蠢材是正在他們的邊境之外等待着準備進攻他們，因此這些邊境是必

須好好地防守的。因此他們去從事建立社會主義經濟的工作就正同古代的猶太人建立他們的廟宇一樣，一隻手握了匠人的括泥板，另一隻手則握了寶劍。而且他們的在說話中提及戰爭，也決不是將它看作一件在遙遠的將來或許可能發生的事情看，而是作為一件立即可能發生的事實看的。他們將戰爭作為一件必須有的痛苦事情看待着，雖然很多爲了它煩惱，可是卻同時又確知着他們自己所做的是正當的事情，正像一個人將要去受那必須有的苦痛手術，而那結果又已經確定知道是良好時的心境一樣。

不過，當然，一切事情仍還是在努力着儘可能的延長戰事爆發，或者甚至連戰爭都一切避免掉。將和平維持到最後可能爆發的一刹那，對於蘇聯是有着極端的利益的。蘇聯現在還正在忙着收拾他自己的房屋，而且他又在一天天地富起來，強起來，因此她當然不但願意在新房子完成以前，不與她的鄰居爭吵，而且她也知道如果戰爭的爆發愈延長，那麼她就一定會愈強壯，爭取最後勝利時所付

的代價一定能愈少。

不過，既經決定了這個戰爭是不管其他一切一定會來的，而且那戰爭在事實上也一定會在今後存在的，蘇聯的人民當然就必須先使得他們自己適合於這個戰爭，而這種蘇聯人民的戰爭心理，也就正像我所已經說過的那樣可以給我們解釋了很多事情，這許多事情否則一定都會變成是不可理解的。我已經說過那些佔着蘇聯游藝最大部份的戰爭戲劇與戰爭影片，以及文學上的大量對於紀念過去內戰時以及各帝國主義干涉戰爭時的英雄們的文字。我所在莫斯科十星期之內在舞台與銀幕上看到的關於屠殺，作戰，以及衝突的場面真是比了一個人在世界大戰時四年之內在前方所看到的還要多。

但將這種戰爭的心理，表示得最清楚的，還是紅軍的狀態。紅軍真是一個有着特殊深長意義的民族軍隊；如果世界上有什麼軍隊夠得上被民衆稱爲『我們的軍隊』的話，那麼紅軍就正是這樣的軍隊。蘇聯人民稱道：『我們的軍隊』的時

候，那種親切之感，是只要一聽到就一定相信那是真實的。在軍隊與人民之間一種最密切的關係是被保持着。紅軍軍官有大部份都是出身於農民以及無產階級的，因此這些領袖們與兵士們，與人民們的心理當然是相同的，而且此外在任何一方面也都有着使人民與軍隊密切聯繫起來的地方。那些紅軍兵士們在家時是常到工人俱樂部中去的，各種的軍隊並且還都提倡獎勵着各種文化以及體育運動的組織。此外，軍隊中的每一部份並且他都有着特別與它發生友誼關係的某一份村莊，或者某一縣份，某一特定的工人或者農民們的組織的。當有巨大的游行時，這些軍隊也決不僅僅就自己去參加，而一定要與地方上的人民一隊一隊地聯合了起來才參加的。

正同羅馬軍隊在羅馬那個時候一樣，紅軍也同樣地將加深對於人民的教育作爲了它的最主要的任務。紅軍已經建立起了良好的戲院，以及巨大的圖書館，並且給與了電影最大的資助。紅軍還曾經出版了很多報紙以及一般文化性質的刊

物。在有一次斯那姆耶，那個在莫斯科最著名的文學出版物給與我的茶會上，我曾很驚奇地遇到了許多的軍官，後來，我才知道這個刊物原來是由軍隊發行創辦的。

那許多軍人的多才多藝都是非常顯著的，特別是他們對於文學的濃厚興趣。作家托洛斯基就會是紅軍的組織者之一，而在今天作家也仍還在軍隊中起着重大的作用。我認識的那幾位將軍就是在新聞界上有着與他在軍隊中同等地位的人。有很多作家都是參加了大戰以及革命的內戰的，而有許多到今天也還仍在紅軍中保持着他的軍官地位，差不多所有的蘇維埃作家對於軍事問題都是非常有興趣的。我還不會在別的國家中看到過那麼多文藝才能與軍事才能合在一起的人物。在蘇聯有許多的作家以及編輯者是都準備着停止了他們的寫作，明天立刻就去寫軍隊的作戰命令的。

在紅軍中，不論是在軍官之間或者是在士兵之間，真正的軍事本身事情倒並

不怎樣十二分多的被討論到。這或者是因為所有這些人都知道他們今後所要從事的戰爭是決不僅僅只需要軍事智識的緣故。

紅軍在今後作戰中，在心理上勝過他敵人的地方就在參加作戰的每一個士兵都是很清楚地理解了作戰的目標的，這種目標對於他不但在愛國的本能觀點上看來是對的，即在理智上說來也是對的。

## 第六章 史太林與托洛斯基

在蘇聯，有許多人是曾經做過戰士，而同時是又會做過工人以及農民的組織工作者的。約瑟夫·史太林在我看來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他有着一個士兵的，革命家的過去：那個查利順城（這城在今天已叫作史太林城）的能夠勝利保衛主要可說就得歸功於史太林。而他在一九一八年秋天所向列寧提出的報告——一個有七十行字長的報告——且會使整個的戰爭計劃從此走上了勝利的道路。可是史太林作為組織者的工作成績比起他的作為戰士的工作成績來是還要大得多。

里昂·托洛斯基在他自己的那本自傳中也企圖將他自己描述成一個有同樣才能的人，即是一個偉大的戰士同時又是一個在建設工作中偉大的領袖。可是他這本自傳，雖然這是托洛斯基的最優等的吹牛者托洛斯基自己寫的，在我看來，

至多也只證明了他的才能是限止於在戰爭的時期內。

當然，這本自傳是一個偉大作家，甚至，或者可以說，是一個悲劇人物的著作。不過那種自己形容自己的地方到底不能反映出他是一個偉大的政治家來。這本書中缺少了一種應有的謙虛，人物性格的力量，以及探討事實真相的眼光，那種無故的傲慢態度常常使他對於事物的可能性變成了盲目，因此雖然我們很爲這種種作家的誇大虛構所吸引住，但他的缺少謙虛對於我們的將他看成一個政治家的概念，總是有着妨礙的。托洛斯基的邏輯是完全建築在空氣中，而不是建築在那種使得政治結果實現必須有的人事關係的智識上的。托洛斯基的那本書是充滿了憎恨，而且從書的第一行到末了一行都充滿了主觀，與狂熱的不公平。他常常將真的事情與假的事情混在一起，因此這雖然使得這本書的內容非常漂亮，可是却很難不使人將他目爲政客。

對於我，只在一件小而可是足以代表的事情上，就使我覺得史太林是比了托

托洛斯基優良：史太林會叫高爾基主編的革命內戰史中加上一幅托洛斯基的像片，可是托洛斯基的書，却就不是這樣，只對史太林充滿了憎恨與輕視，而且對於他的優點也充滿了惡意的抹煞。

當然，對於一個失敗者，是很難維持客觀的。托洛斯基，也是知道這一點，而且曾經用了很漂亮的說話將他表示過的。在他那本自傳的前記中曾結論道：『我是決沒有那種將歷史上的事情因了個人的憎恨而加以輕視的習慣的。認識了事物的必然規律而在這中間找出他自己的地位來，這可說是作爲一個革命家的第一個任務，同時也可說是對於一個不願將他的工作效果僅只限於當前時日的人的最大滿足』。

可是在我看來，自從他失敗後今天威脅着托洛斯基的危險——這種危險是對於每一個失敗者都有的——再沒有比『將歷史上的事情因了個人的憎恨而加以輕視』這句話說得清楚的了，托洛斯基是看到這個危險的。他很清楚地知道這兩個

極容易去犯同時又必然會去引誘他的錯誤。他是知道這危險，決定着不去犯這個危險，可是還是犯了這個危險。他看到的是很好的路，可是所選擇走的却是很壞的路。

托洛斯基在我看來，完全是一個純粹革命者的典型。在戰爭的感情衝動中有很大的用處，可是一到環境需要冷靜，堅強而又系統的工作的時候，就再也沒有用了。那個革命的英雄的時期一過去，他對於事物的看法就已變成歪曲，而開始對事物作錯誤的看法了。托洛斯基雖然很頑固地因為列寧曾經接受過他對於事物的觀點，所以仍緊抱了那些在革命的內戰時期的原則不放，可是這些原則其實是一到恢復平常的日子就必須放棄的。正像他自己書中所說的那樣，托洛斯基是懂得怎樣當羣情憤激的時候將羣衆帶走的。真的，當感情達到高潮的時候，他是確能夠將熱情的洪流予以爆發的，可是他所不能的，就是不會將這熱情的洪流『引導』到將它轉變為建立巨大的國家的力量。

這事情是只有史太林才行。

托洛斯基實在是一個天生的作家。他的文章寫得很好。可是托洛斯基的悲劇就在他的並不知足於做一個作家。這一種不知足使他成爲了一個歡喜與人爭論的空談家，而且由於他自己所犯的錯誤，以致很多的人都因此反而忘記掉了他的優點。

像這種樣子典型的作家與革命家，我是知道得很多的。譬如有些在德國革命時的領袖，就差不多是這樣的。他們往往固執於一種教條，不使他們自己適合於各種環境——總之他們是缺少了一種實際的政治心理——以致使他們只在一個短短的時期中適合於政治的行動，在他們生命中的大部份時期都是作家，而不是政治家。他們不懂得怎樣去接近人民的心。他們也不夠十二分懂得羣衆的心理。他們雖然覺得很接近羣衆可是羣衆却並不覺得接近他們。

當托洛斯基與史太林之間因了在各種重要事情上意見相異而發生巨大衝突的

時候，這種意見的相異實在是由於一個更根本的不同點造成的。這是因為他們兩人的性格根本不同，所以終於使他們對於俄國革命中的許多最重要的問題，如民族問題，農民問題以及在一國之內建立社會主義到底是否可能的問題，發生了敵對的意見。史太林的意見是認為不經過一個世界革命，完全的，實際的社會主義也能建立的，而且因了各種蘇維埃人民對於民族國家利益的保衛即在一個單獨的國家中也可以建立起社會主義來的；他並且還相信俄國的農民在他們本身也有着社會主義的可能性。可是托洛斯基就反對這些意見。他認為世界革命是建立社會主義的必須條件，他因固執着認為馬克思的政策是絕對國際主義的；因此他創造了不斷革命的戰略，並且用了許多馬克思學說來證明在任何國家中單獨建立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

但至遲到一九三五年的年底，全世界是承認社會主義已經在一個國家內建立起來了，而且軍事的力量也已經爲了保衛這個新機構，反對任何的侵略而創立起

來了。

托洛斯基在這時候還能打算作什麼呢？當然，他能夠保持沉默。他能夠承認他自己失敗並且說他是錯說了。他能夠使他自己再與史太林講和。

可是托洛斯基覺得這些都是不可能的。他不能夠按捺住他自己。因此這位能見人所不見的人，終於對於連小孩子都已看到的事情反而見不到了。在蘇聯，食物是已在大量產生，機器也已在轉動，原料更是空前的在增多，整個的國家並已都電氣化與摩托化了。可是托洛斯基却不願承認這些事實。他說所有這許多事情能夠這樣快的完成，以及建設的那種熱情的速度，是必然會結果使事情變成非常脆弱的，蘇聯——托洛斯基將他稱作『史太林國』——一定會遲早變成粉碎，而且只要法西斯列強一開始進攻，就會瓦解的。因此托洛斯基就用了最大的憎恨反對那使建設變成了事實的人。

可是史太林又是一個怎樣的人呢？

好久好久以前，他就將他自己埋首於對於這些戰後一天天會變成緊迫起來的問題的研究之中了。早在一九一三年的時候，列寧就曾寫信給高爾基說：『我們現在有着一位良好的喬其亞人在這裏從事寫作一篇關於民族問題的文章，這個問題是的確應當給與更多的注意的』。

史太林就是這樣在研究着。他是有着思想；證明了他自己是一個組織家。可是史太林並不是一個長於炫耀的人物，因此與托洛斯基比較起來，無甯說是他躲在後面的。托洛斯基是一個良好的演說家，也許他自己也以爲是當代的最好演說家的吧。史太林說起話來，則正像我在前邊所描寫的那樣，雖然並不是沒有幽默，可是有的時候是非常嚴肅的。因此他不得不以艱苦的工作去取得人家的知曉，而這在別的人是很容易就取得的。他所今天得到的地位，是完全由他的事情得來的。

因此，有許多年，那種托洛斯基的不真實的卓越才能，竟使人家延遲了對於史太林更真實的優點的認識。不過，當托洛斯基的概念開始變成歪曲而且崩潰的

時候，史太林是第一個人看到了這一點而且給與了表示的。早在一九二四年的十二月，史太林，就已經變得相信，正與當時流行的學說相反，在一個國家內建立起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來是完全可能的。而且邏輯地說起來，史太林也許是比了列甯還更清楚而且用確定的語氣指出了當時爲什麼這樣做是可能的條件來的：因了繼續增長的國家的工業化以及農民合作運動的展開。史太林是很明確地主張那個在這以前爭論得很厲害的問題，即大部份的俄國農民只要黨的政策運用得正確的話，是可能被吸收進社會主義社會來的，他簡單地，嚴肅地，而且是不可爭地證明了這一點。

可是托洛斯基，用着他的炫耀的修辭，也正同史太林的不可爭論的議論一樣不可爭論地反駁着這些意見。史太林是知道他的議論是在真理一邊的，可是他也不能忽視還有許多的人在相信着托洛斯基的漂亮可是不真實的話。

因此史太林決不僅僅看到了並且說出了真理爲滿足。他繼續向這方面行動：

他開始了工作，他組織起了農民，將他工業化了，置下了社會主義在蘇聯的基礎，並且將社會主義建立起來了。史太林所創造出來的事實就否定去了托洛斯基的不可爭論的理論。

可是托洛斯基是決不願意認輸的。他繼續發表了很多演說，寫了很多漂亮的文章，小冊子，書籍，要想證明史太林的事實完全只是一種虛偽的事情，因為這是不合他的理論的。於是托洛斯基就變成搗亂的勢力。黨的大會將他除了名，最後他並且被放逐了，禁止再回國去。

史太林的工作是興盛的。煤，鐵，以及金屬的礦苗是被找到了；發動力的站也建立起來了；重工業現在並且也已經並不比了別的國家落後了；大的都市建築了起來；抵押放款增多了；農民的小布爾喬亞性是克服了，他們的公共農場表現出了成績，因此他們的要求加入集體農場也與日俱增了。如果說列寧是蘇聯的凱撒的話，那麼史太林就變成了奧古斯多，他的事業的擴大者。史太林的事業是愈

來愈多了。但他也並不就忽視了這個事實，仍舊還有很多的人是拒絕信任這些可以看得見的具體工作，而反去相信托洛斯基的空論的。

甚至即使在那些史太林的最要好的朋友中間，那些史太林將他給以要職的人員中間，也有着相信托洛斯基的說話而不相信着史太林工作的人。於是他們就阻礙工作，反抗工作，或者懈怠工作。他們因此而獲得了罪過，可是史太林仍寬恕了他們而將他們還是放在緊要的職位上。

當史太林終於發現出他的這些同志與朋友們，不管他的工作是怎樣成功，而還是與他的敵人，托洛斯基勾結着，秘密地對他有陰謀而且想對他的工作怠工，以便仍舊使他們的舊時領袖回國的時候，我真不知道史太林的思想與感情當時會是怎樣？

當我看見史太林的時候，第一次托派的審判，即齊諾維夫與卡米奈夫的審判

是已經完結，被告已經被判決而且槍決了。而第二次的托派審判，即對於蒲塔可夫，拉狄克，布哈林，雷可夫的審判則還沒有定，因此結果如何，誰都還不知道。

正是在這個停頓中間，即在兩次審判案的中間，我會見了史太林。

他的畫像常常使人得到一個印像就是史太林是很巨大的。可是實際上，却是正相反，他是相當小的。他在我會見他時的克里姆宮房間中間看來，簡直是像會消失掉了似的。

史太林說話很慢，而且是用着一個低低的，沒有變化的聲調。他不歡喜用短促的問答體的說話方式而甯可用慢慢的，經過了考慮的句子。他的說話，有時候，就簡直像在默書。當他說話的時候，他總來去的走着，然後忽然跑到您面前伸出一只手指來向您詳盡地解釋着一切，或者當他是在考慮什麼句子的時候，他就用紅綠鉛筆在一張紙上劃着阿拉伯字與統計數字。

我所要與史太林討論的事情，事前並沒有約定。我也並不會準備任何種的說話題目：因為我是想看到了這個人的印像之後然後臨時再看情形決定我所要說的事情。我是很怕我的說話也變成以前史太林所與西歐的幾個作家的說話一樣變成多少是官場式的，或者是呆板固定了的說話。而在最初的時候，我們的說話也確有些像是這樣的情形。我們說到作家在社會主義社會內的作用，那些甚至即使是守舊的作家，譬如如果戈理的革命作用，以及智識份子，他所受到的階級支配作用的限度，蘇聯的言論寫作自由等等。在最初，史太林是說得非常小心謹慎，而且是用着普通的語調。可是漸漸地他的說話多起來了，不久我就感到了我是可以與這個人坦白地講話的。於是我就坦白地說，他坦白地回答。

史太林說話是一點也不用修飾的，而且，他能將複雜的意思用簡單的說話表示出來。有的時候他說話差不多太簡單了，簡直有些像是他將他的思想公式化了，預備全國都能去瞭解它的樣子。他或者是可說沒有機智的，但他顯然是有着

幽默，而且他的幽默有些可怕，他不時的笑起來。他對各方面都很熟悉，能夠從記憶中無錯誤地引證出很多人名，日期，事實來。

我們曾談及寫作的自由，說及民主，以及我所已經提及的關於許多人的過分崇拜史太林的事情。只在談話的最初的時候，史太林還用着各種黨的字彙，但不久他就不像一個黨的領袖而只是一個個人了，他說話也並不是不反駁，但他常常是很客氣的，精巧的。

當我談及托派審判案時，他變得非常憤激，而且詳細地說到了蒲塔可夫與拉狄克的被起訴的理由，這在當時是還大家都不很清楚的。他又說及法西斯蒂恐怖所在人民中間引起的可怕的災難。我則同時又告訴他，當齊諾維夫審判時，那種簡單的審判過程曾經在國外，即使是對蘇聯有着最好希望的人中間也引起了不良的印象。而史太林則對那些一定要有了很多的文件證明才相信人家是叛變的人笑了一笑，他說，一個真正從事實際陰謀活動的人是決不會有這樣的習慣來留下了

很多的文件給大家看的。最後，他很苦楚地提及他對作家拉狄克的感覺，這是一位被牽入在第二次托派審判案中的最著名的人物。他描寫他對於拉狄克的友誼。『你們猶太人』他說，『曾經創造了一個永久是真理的傳說——那就是出賣耶穌的門徒猶大的故事』，對於一個在別方面非常嚴肅而且合於邏輯的人忽然會說出這樣的簡單而感性的話來，真是使聽到的人非常感到奇怪的。他又說起拉狄克曾經寫過一封長信給他根據了許多不可靠的理由要辯白他的無罪。可是在第二天，在見證與各種證據的壓力之下，他到底不能不承認自己是犯罪了。

那麼約瑟夫·史太林是不是就恨這位里昂·托洛斯基呢？我想，他是應當恨他的。我已經指出了他們兩個人在性格上，在意見上的絕對相反。里昂·托洛斯基，這位作家，有着很靈敏的思想，但常常是不正確的。約瑟夫·史太林雖然思想比較遲慢，然而是正確的。托洛斯基是個傑出人物，但史太林却是俄國農民

以及工人的典型，他是必然會得勝利的，因為在他的身上兩個階級的力量是都團結起來的。托洛斯基像是一種一下子就會消滅的火炬，但史太林却是溫暖的，可以經久的火焰。

橫放在史太林面前的是有着一個巨大的工作，並且是一個需要着即使是非常強壯的人也得去化整個的力量從事的工作，可是托洛斯基却還在其中搗亂，使得史太林不得不再化時間去從事彌補的工作。在這一點上說起來，恐怕史太林是恨托洛斯基的。但如果我們的理解認為史太林就只是憎恨托洛斯基，則還是不夠的。史太林，這位偉大的組織者，他能在農民的本身上，尙且看出社會主義的可能，所以他是即使對於他的反對者，他也企圖能夠將他運用起來的。他雖然被有些人稱爲粗魯，但他實際上的確是有許多年要想企圖爭取托派，而並不是單純的就想破壞托派的。這從他的使他們許多人從事工作可以看出。

## 第七章 托派審判案中之已發表的與未發表的

可是，最後史太林終於決定將這些托派們置之於法了，因為他已經完全證明了這些托派是在作着叛逆，間諜，破壞以及其他一切非法的活動，甚至想準備暴動。

我對於齊諾維埃夫以及卡門奈夫審判時的情形是從報紙上的報告中得到的；而我對於蒲塔可夫以及拉狄克的審判則並且是我自己親身出席旁聽得到的。因此我對於托派的第一次審判可說是在西歐的環境中經過的，而對於第二次的審判則是在莫斯科的環境下經過的。將在莫斯科的一個人對於這些審判的反應與在西歐的一個人對於這些審判的反應比較起來，那麼我們立刻就會明白在蘇聯與西方之間的整個不同。

在我的許多朋友中間，有許多人在別方面還不算怎樣糊塗的，可是這一次對於這些審判竟感到了是澈頭澈尾的野蠻，與不可信的事情。有許多人在先前是作着蘇聯的友人的，可是這一次因了托派審判的結果，也成爲了蘇聯的反對者。那些曾經在蘇聯的社會制度內看到了社會主義人道主義的理想的，這一次也因此驚呆住了，因爲在那些人看來，向齊諾維埃夫與卡門奈夫所發的槍彈實在不但毀滅了他們，同時也還毀滅了整個的新世界。

在我自己呢，也同樣，當我還在西歐的時候，我覺得齊諾維埃夫的公訴狀簡直是不可信的。那些被告們在法庭上歇斯的里般的供詞也好像是用了什麼神秘方法才變成這個樣子的，而整個事件的進展也完全像是一幕已經排演成熟了的戲劇。

但當我參加了在莫斯科的第二次審判，當我看到了蒲塔可夫，拉狄克以及他的朋友們，並且聽到了他們的說話，他們說話時的情形，我是不得不接受我的感

冊所給與我的證據了。而我的懷疑同時也就像鹽溶化在水裏一般的很自然地溶解了。因為如果說那樣的事情還是謊話或者是預先佈置下了的事情的話那麼我就不知道世界上真理到底是怎麼一會事了。

因此，我打算再來說一下審判的經過以及我所親眼看見，親耳聽到的情形，並且再將贊成與反對雙方面的意見來考慮一下。

根本上說起來，這件事情當然完全是爲了托洛斯基而起的。而許多人的反對也就是爲了這一點，他們不相信托洛斯基是那樣的。反對者說：『這位托洛斯基，曾經是蘇維埃國家的創造者之一，列寧的朋友，可是現在却說他在指使着人家向建設這個國家的工作怠工，挑動着向蘇聯的戰爭，並且在計劃着在這次戰爭中使蘇聯失敗。這事情是可以相信的嗎？可以認爲靠得住的嗎？』

但話雖如此，如果我們仔細考察起來，那麼托洛斯基今天爲人所說的罪狀，不但不是不可信的，而且是在托洛斯基今天的心理狀態之下唯一可能有的行爲。

托洛斯基本是非常活動的，可是現在却被強迫着不要他顧問蘇聯的事情了。托洛斯基同時也是有着非常遠大的計劃的，可是現在他的計劃已都被史太林證明爲空想了。托洛斯基曾經屢次表示過他對於史太林的無限的憎恨與輕視。因此我們又怎麼知道他不曾將他在談話與寫作中間所已經表示過的事情再以行動來表示呢？

在我看來，同時這也是可信的，因爲凡是一個人因了憎恨而變成盲目不願使他自己承認蘇聯經濟建設成功的各種事實以及紅軍力量的人，是一定也會看不清楚他自己行動的無效而去走上一條很明顯是錯誤的道路的。托洛斯基是勇敢而且敏捷，一位偉大的投機者。他的整個一生就是一大串冒險，而且他的那許多計劃有的時候也常是成功的。托洛斯基，爲了要達到他的目的，常甚至不惜去利用一切最壞的事情。因此歷史上如果會有過賣國賊的話，爲什麼托洛斯基就不能去與法西斯主義者勾結呢？

而且托洛斯基也從來不會是一位俄國的愛國者；史太林政權在他看來簡直是一個仇敵：他所關心的，就只有世界革命。將放逐了的托洛斯基所對史太林以及蘇聯說及的話搜集起來，那就簡直可說極盡漫罵，諷刺的大觀。因此在這許多放逐的年頭內，托洛斯基還可能有什麼其他主要的目標呢？他當然只會想用一切代價回到他自己的國中去，同時再握起政權來。

『托洛斯基的非布爾雪維克的過去是決不是偶然的。』這是列寧所在遺囑上說的話，而這話對於托洛斯基的去與法西斯勾結，也同樣是可以適用的。

至於那些出現在第二次審判案中的蒲塔可夫，蘇可兒奈可夫，拉狄克等人呢，許多人都都為他們辯護說像他們這樣在蘇聯佔着主要地位的人，也會對國家的工作怠工並且參加那些犯罪的陰謀，恐怕是不可信的。

可是在我看來，如果我們單將這些人看作是有地位有勢力的人是錯誤的。蒲

塔可夫與蘇可兒奈可夫決不僅僅是高級官員，而拉狄克也決不僅僅是新聞報的主編，史太林的朋友與顧問。大部份的被告都是，在另一方面，同時就是第一流的陰謀家與革命家。整個他們的一生都是在過着那種陰謀與革命的生活——他們是天生就是那樣的，任何他們所已經完成的事業都是因了他們的勇敢，他們的愛好冒險，以及他們的樂觀主義而才完成的。並且，此外，他們又都相信着托洛斯基，這個人的暗示力我們當然是不能忽略的。因了他們的領袖關係，他們在史太林政權下所看到的一切事情，當然完全變成對於他們所要完成的事情是一種諷刺，而他們的主要工作目的，因此當然也就是要依照了他們的自己概念改革這種狀態了。

而且此處，我們也必須同時不能忽略掉了那些被告們在這次革命中所必然產生的個人野心。在這許多人中間沒有一個人對於權勢的野心是有所滿足了的。他們果然有着高級而且榮譽的職位，但他們中間還並沒有一個人是佔據了最高的職

位，而這樣的職位在他們想來是應當屬於他們的。當然他們也會經受過優待，但他們既在法庭之前作爲托派而出現過，他們當然是決不會再有機會升高他自己的地位了。所以在這一點意義上說來，他們可說是全體降了級，而『一個革職了的官員往往是最有危險性的』這事情，是拉狄克他自己也說過的話。

許多人的反對這次審判，除了罪狀之外，反對得最烈的，那就是審判時的手續了。懷疑者們說，如果他們是有着證件以及見證的人的話，那麼爲什麼他們不將文件以及證人拿出來而只讓被告們到法庭上來自行招供呢？

蘇聯人民對於這件事情的回答是這樣的：在這次審判中我們是的確曾在某種程度內只將審判的結果公開了出來的，我們已在事先將證件等檢查過，並且在被告的面前提出過。因此在正式的審判時，我們就只要使他們公然地招認一切就夠了。任何人對這事情有異議的，他必須記住在一個軍事法庭前面舉行公開的審判，主要當然的一定是爲了政治作用的。我們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使得全國的人

民都知道這事情是錯誤的。因此我們必須使得每一件事情都儘可能的簡單，明瞭。如果詳細的舉出許多證據文件來也許對於法學家，犯罪學家以及歷史家是有興趣的，可是一定會使我們的蘇聯人民反而因此觀念模糊。清楚的供詞對於他們是一定會較任何搜集的證件來得更可理解，我們的所以這樣做，都完全是爲了便於我們自己的人民，而決不是爲了便於外國的犯罪學者。

在這些被告的供詞中，最顯著的特徵，當然無疑的是他們的說話完全一致。因此懷疑者們就又說一定是應用了什麼方法所以他們才會這樣的。

而第一個最合理的假定，當然，就是說這些供詞一定是給與了罪犯們什麼酷刑，或者酷刑的恫嚇，所以他們才變成這樣的。可是這第一個假定，因了這些罪犯們的無論身體方面或者精神方面，都非常完好，因此遭受了否定。於是那些懷疑者們爲了解釋這個『不可能』的供詞，就又不另外再找其他的藉口了，於是他們說，這些罪犯們是已經遭受了各種的毒害，並且是已經被催眠與被下了

毒的。可是這事情如果是正確的話，那麼這是開科學史上新紀錄的事情了。那些執行這件事情的科學家們，我想是一定不會甘願只作政治上的陰謀工作而寧可將他的方法公開出來取得他在科學界上的地位的。那些對於這次審判不滿的人都是可說寧可去相信這些不合事理的假定，而不願去相信就在他手邊的事實的人——因為這些犯人已經都深深服罪，所以他們的供詞當然是根據了事實而說的。

因此如果有什麼人去對蘇聯的人民提及上述的種種假定时，他們一定會聳聳肩將它置之一笑的。如果我們要偽造事實的話，他們說，爲什麼我們一定要偽造這種難於偽造的口供呢？去偽造文件不更比較起來容易嗎？而且您難道不相信我們與其將托洛斯基的罪狀經過了蒲塔可夫與狄克的嘴宣佈出來不如就只將足以更直接證明托洛斯基與法西斯勾結的信件公佈出來來得容易嗎？您是曾經親眼看見過，親耳聽到過這些被告們的情形與說話的。您得到了什麼他們的口供完全被迫着才有的印像沒有呢？

真的，我可說是一點也沒有得到什麼這樣的印像。這些站在法庭前面的被告們並不曾受到什麼刑罰，而且也不像是什麼站在執法官面前已經宣告絕望了的人。在這次的審判中簡直是一點也沒有什麼，人工做作的氣息。

在那間執行審判的房間內地方也並不十二分大：大概可以容納三百五十人左右的樣子。法官，檢察官，被告，被告律師，以及專家們則都坐在一只低低的台上，在法庭與羣衆之間也並沒有什麼阻隔的東西。被告所處的地方也並不是特設的，這些被告們都服裝很整齊的，帶着極自然的表情。他們喝着茶，衣袋內並且還藏着報紙，不時的向羣衆看着。因此這整個的審判就看上去簡直不像是一個審判而反像是許多深受教育的人他們爲了要得到一種真理，並且給已經發生的事情爲什麼會發生的理由給與一種解釋而在那裏用討論的語氣開着一個討論會。所以如果說像這樣的法庭而是事先佈置了的話，那麼這個佈置者真不知要化掉多少氣

力在排演這件事情上才能使得這些罪犯們達到這樣的成績。那些催眠術家，毒藥的藥劑師，以及準備這些事情的政治官吏們，除了他們的通常資格外，都非是頭等的舞台經營者以及心理學者不可。

所可惜的是蘇聯的法律禁止在法庭上攝影並且收音，不然的話，我想，只要給全世界將這些罪犯們的說話重說一遍，同時將他們說話時的態度，音調，容貌也重複表演一遍的話，一定再不會有人對這次的審判懷疑的。

所有的犯罪者都是坦白地招認了一切的，不過各人的方式當然都不同。有的語調中帶着冷嘲，有的語調中帶着兵士的直爽；而有的則顯然在那裏克服着自己的感情，有的像一個煩惱着的學生，而有的則簡直像在演說，但無論什麼人，他的語調，他的外表以及他的姿勢都是非常真實的這一點却是無疑的。

我永遠也不會忘記喬治·蒲塔可夫站在擴音器面前時的情形，他是一個普通身材的中年人，頭髮已有一些禿，而且有着一些帶紅色的稀疏的硬鬍子的人，同

時我也不會忘記他那說話時的神情。他說話時非常冷靜，同時又非常謹慎，他解釋他是怎樣計劃着對他指導下的工業實行怠工，他解釋時，用他的手指指點着，使人覺得他簡直就像是一位學校中的教員，或者是像一位歷史家正在講述着一個已經死去了許多年名叫蒲塔可夫的人的生平事迹，所以他是急切地對即使是極小的處所他也要講得非常清楚，使每一個聽衆都能完全明白。

對於卡爾·拉狄克這位作家的情形，我也決不會輕易忘掉。他是穿了一套棕色的服裝坐着，他的醜而瘦削的臉上配着許多棕黑色的鬍子，他不時的對羣衆看看，在這些羣衆中間有一大部份他都認識的。他時常對旁的犯人笑着，這笑有時竟是帶諷刺性的，當他走進室內的時候，他並且將他的手臂用一種輕快的姿勢環繞着一二其他犯人的肩膀。拉狄克說話的時候，他有時要對別的犯人做作一下或者笑一笑以顯出他的優異，能幹，與有修養。略帶一些粗魯地他將蒲塔可夫從擴音機口推開後，他就自己站在那地方講了起來。他常常將他的報紙在欄杆上摩擦

着，或者拿起他的茶杯來，丟一塊檸檬進去，攪一下，而當他講及最殘忍的事情的時候，他就拿起杯子來啜一口。不過。當他說到他的結論的時候，他是不再有所做作了，在那結論中他說明了他的不得不招認的理由，因此儘管他還是非常鎮靜，這個說明到底給與了人家一種印象那是一個人經過了很大的煩惱之後而後有的自白。不過，最使人感到驚奇而且難於解釋的是拉狄克當他審判終了離開法庭時的姿態。這已經是早晨四點鐘的時候了，每一個人——不論是法官，被告，以及聽衆——已經都非常疲倦。在十七位被告中，有十三位都是拉狄克的知己朋友已經被判處了死刑，而他自己以及其他的三位也已經被判處了囚禁。法官念過判決書，所有我們聽着的人都站了起來，——犯人以及聽衆們都一點也不動地寂靜着。當法官念完判決書後，立刻法官是退了下去，於是兵士出現了，他們一跑上來就首先向未判決死刑的那四個人身旁跑去。兵士中的一個曾將他的手放到拉狄克的肩上，這顯然是要他跟着走。於是拉狄克就跟着他走了。他掉過身，舉起

一隻手來招呼，輕輕的搖了搖他的肩，就向別的人，那些他的被處死刑的朋友點頭告別，並且笑了。是的，他笑了。

要忘記去工程師斯脫羅洛夫的那種詳細而又具體的陳述也是非常不易的，他訴說着他是怎樣的被拉進了托派的組織中間去，以及他又怎樣的努力着要脫離這種組織，但托派組織已經將他抓得緊緊的，用他所已經做的工作威嚇着他，而不再讓他出去。有着鬍子的猶太補鞋匠杜勃尼斯的印象也是不易忘記的。他在內戰中間曾經受過沙皇的六年監禁，並且曾經三次被反革命軍隊判處死刑而終於給他神奇地逃走掉。可是，他現在是被牽入進這次的審判了。輪到他說話時，他公然地承認了他曾經設法爆炸許多東西，這不但引起經濟上的損害，同時也還置了很多的工人於死命。工程師諾爾金的樣子，也是很使人感動的，他的臉色因了激動而變成蒼白，他說到最後，竟痛罵起托洛斯基來，因此他說完後就不得不離開法庭，因為他已病了。從整個的審判過程中說來，他可說是第一個，同時也是唯一

的一個變成興奮了起來的；否則法官，檢察官，及被告們可說都是一點都沒有感情冷冷的說着話，甚至在這些人中間沒有一個人曾經把他的聲音抬高了說話的。

除了我在前邊所已經提到過的那許多反對者的理由外，懷疑者們因此就又產生了另一種懷疑。他們認為這些罪犯們在法庭前的態度簡直找不出心理上的解釋。懷疑者說爲什麼，這些罪犯們不但不掩飾他自己的過失而反要一個個地來承認他自己的罪惡呢？而且那些所承認的話，又都是將他們自己的行爲說得簡直不像是人做的事情，爲什麼他們也不像別的犯人一樣地在法庭面前辯護他自己，而反要相反地，將自己更多地認些錯誤呢？他們既是相信托洛斯基的理論的，爲什麼這些革命家們就不稱道他們的領袖以及他的學說呢？爲什麼，他們這一次，既是最後一次在羣衆之前說話，不大大地將他自己所做的工作稱道一番呢？他們中間有三個或者四個人也許可能是自暴自棄了，但爲什麼所有的人都這樣呢？

蘇維埃人民對於這些問題的回答，是很簡單的。這就是因為這些犯罪者們在初審的時候已經給所有的見證與文件證明得無話可說，所以他們已經感到如果再要抵賴一定是全無用處的了。而且他們的全都招認這事實也確是可以有解釋的，雖然這在西方各國的人民看起來，也許要覺得奇怪一點。現在且將我所想到的略為說一點在下面：

審判這次托派的法庭，在性質上，我們如果稱之為黨的法庭，一定是非常正確的。從青年的時期起，這些被告們就已經都是黨的依附者，他們中間的幾個甚至已經是處於領袖地位的人了。因此，如果我們將這些站在黨的法庭之前的被告們與在平常法庭之前的被告們去比較這一定是要錯誤的。拉狄克曾經稱法官為：『法官同志』，這決不僅僅是一句口頭禪，因為這是證明着即使是這些被告們，他們仍還是感覺到他們自己是與黨有聯繫的。因此他們的審判，也當然要變成好像是一個討論會了，這些法官們，檢察官們，以及被告們是不但在表面上為一共

同的目的所聯繫着而同時也是實際上確是聯繫着的。他們就正像一羣曾經有一架新式而又複雜的機器要去試驗的工程師一樣。他們中間有幾位竟將這機器損害了，不過這不一定是由於惡意，而是因為他們太堅持要去試驗他們自己改進這架機器的理論了，他們的辦法已經證明是錯誤，但是他們要改進這架機器的心却還是與別的人一樣。因此他們就很坦白地將他們的錯誤完全說出來。

這些犯人們都是托洛斯基的信徒，這是不錯的。托洛斯基失敗後他們仍還是對他有着信仰。但是他們是生活在蘇聯之內的，因此那些對於托洛斯基看來也許是空洞的數字與統計，但在這些被告們看來却完全是具體實現了的事實。看到這些具體實現了的事實，托洛斯基的那種認為在一國之內不可能實現社會主義的原則當然是不能再堅持下去了。因此在一九三五年的時候，因為看到蘇聯的繼續增強繁榮，這些被告們就已經不得不承認托洛斯基主義的破產。拉狄克說：『他們已經失去了他們對於托洛斯基主義的信心。』在這樣的情形之下，被告們的供詞

當然一定是會變成對於史太林統治的讚美的。

譬如被告摩拉洛夫就會經有八個月之久否認他的罪狀，但在十二月五日他終於承認了。在這次審判中，他說：『雖然我也以為托洛斯基一般給我們的指示，要實行恐怖與怠工是錯誤的。可是我總覺得在道德上好像不可能做一個托洛斯基的叛徒似的。當最後，別的人也都對組織不再充分支持的時候，我就對我自己的說：「我曾經在三次革命中爲了蘇聯而鬥爭過，而且有十多次我的生命都幾乎只差得一錢。現在我是不是應該還是仍舊爲了蘇聯的利益而奮鬥呢？或者還是繼續相信托洛斯基而去傳播他的錯誤理論呢？」這在我是一個轉變點，後來我就對我自己說：「好吧，我決定從此還是向完全是真理的那一邊走去吧。」』拉狄克的說話，雖然所取的形式不同，可是結論也是差不多的。這兩個人的說話，對我都感到很大的心理學上的興趣。因爲他們正巧是一個榜樣，告訴了我們在什麼限度之內人們會去服從一個傑出的領袖，而到了什麼一點上，人們又重複再會去與這

個領袖分手。托洛斯基，當他的基本理論已經證明是錯誤了以後所採用的那種粗暴而又絕望的手段，當然必然是會使他愈來愈少的信仰者更稀少的，這些托洛斯基的過去信徒們都已經開始從他的方法中看出了他的瘋狂性來。而他們的所以還不公然地提出聲明與托洛斯基脫離關係者那是因為他們還不知道應當怎樣將這事來提出的緣故。拉狄克說：『如果警察不己先來找我們的話，我們一定會去找警察的。』而這句話，當然我們也很易於相信的，被告中間有幾個，事實上就確曾是自己先去自首了，然後整個的陰謀計劃才暴露的。

因此在懷疑者所提出的那許多理由中間，也有一個理由是有相當根據的。人們如果真對一件事物信仰了，那麼他一定會在他生命的最後一霎那也不放棄他的信仰的。因為他們知道這是他們在羣衆中間最後而且也是最大的一個說話的機會了，他們當然一定會利用了這個機會宣傳他們的理想的，無數的革命家在希脫勒法庭之前就會經這樣說過：『是的，我確是這樣做的。您可以將我處死，但我還

是很對我所做的事情認爲驕傲。』那麼爲什麼在這些托派中間竟沒有一個人這樣做呢？爲什麼他們中間的人就沒有一個人這樣說：『是的，您們史大林政府是錯的。托洛斯基是對的，我所做的一切都是爲了要求社會的完美。您可以處死我，但我還是相信托洛斯基的』。

可是對於這個懷疑者的疑問是也有一個有力的答覆的。這些托派們的爲什麼不採取這個態度，就是因爲這些托派們是不再相信托洛斯基了，因爲在他們自己的心目中也不再贊成他們所已經做的事情了。他們所相信的托派理論已經很明顯地爲事實所完全否定，只要任何人有眼睛可以看東西的都不會再相信它了。他們既然自稱是社會主義者，那麼在他們臨死前出現於羣衆的一霎那，他們當然沒有別的办法只能自己承認：『社會主義是決不能用了托洛斯基的方法來實行的，用我們所行的方法來實行的，要實現社會主義就只有用另外一個辦法，——卽史太林的辦法。』

不過我們即使丟開以上所說的種種觀念上的動機不論，只要嚴格地考慮一下外界的環境，被告們恐怕也是只能承認他自己的罪惡的。他們已經是被證件所折服了，他們還能有什麼話說？如果他們從實說，那麼他們也許還能有一些被寬恕的希望，否則那就完全完結。既然從實說，並不違背他們的良心，那麼他們又爲什麼不從實說呢？

比了解釋這些罪犯們的動機更困難的，我覺得倒是解釋政府爲什麼要將這次審判完全向全世界公開出來的問題，政府所希望這樣做了得到的結果什麼呢？這樣做的結果不是必然地會引起很多的麻煩嗎？齊諾維埃夫的審判就曾經使外界發生了一個很大的騷擾。因爲這審判供給了蘇聯的反對者許多最歡迎之不暇的宣傳資料，以至使很多蘇聯的友人們都感到了動搖。這事情的發生使人因此懷疑到了蘇聯統治的穩固性。那麼爲什麼，蘇聯政府還要舉行一次這樣的同性質的審判

呢？

這理由，蘇聯的反對者是這樣解釋的。這完全是因為史太林的專制，他的歡喜恐怖。因為史太林是完全一位極喜採取對他有過損害或者對他有過威脅的人物，殘忍的報復手段的。所以正與希脫勒一樣，他是要將他的四週人物完全清除乾淨的。

可是像這樣的說話，當然是全無根據的。我們只要一讀任何史太林的書籍，或者演說詞，看一下他的肖像，想一想他所爲了建設的目的而採取的各種方法，一定就會完全明白史太林是怎樣的一個人，而決不會採取什麼報復手段的。

我相信對於這個問題的正確解答，還是應當向兩方面去想，即蘇聯的民主化與目前蘇聯所盛行的戰爭心理。

蘇聯目前的繼續民主化，特別是在新憲法起草以後，當然一定是會給與托派份子一種新的刺激，而增加他們的活動機會的。因此政府當然認爲從頭毀去一切

托派份子的活動，現在是已經到了成熟的時期。不過，最主要的，當然還是因為戰爭的危機使得這些蘇聯的領袖們不得不將這些審判來公開的舉行了。在這以前，托派份子的危險性是還少些，也許還可以寬恕他們，至多也只給他們放逐。可是現在，在這戰爭危機一觸即發的當前，像這樣的寬大當然是不行了。一個在平時也許是不重要的裂口，在戰時是可能變成極大的危險的。因此自從基洛夫被暗殺後，蘇聯就組織起了軍事法庭專門來對付托派，審問這些人的是軍法會議，而判決這些人的也是軍法會議。

因此蘇聯現在可說是有着兩個方面：代表着戰鬥的蘇聯的是她的不惜用一切強硬手段將所有的反動份子都鎮壓下去的事情。代表着建設的蘇聯的那就是已在憲法中表示出了她的最高理想的民主。這事情是很可注意的，因為正是在兩次的托派審判案之中，即在齊諾維埃夫與狄克審判案之中，蘇聯的特別國會通過了

新憲法。



## 第八章 憎與愛

因了托派的審判，曾經引起了很多人的對於蘇聯的強烈反對，甚至那些過去認爲蘇聯是民主制度最高理想的，現在也都認爲失望了。

可是對於這許多因此而失望，不滿的人，如果我們仔細考察起來，實在他的基本原因還是在於他的理智認識的不足，在於他的原來就有的因了蘇聯存在而所引起的不安心理在那裏作祟。

真的，有許多智識份子，即使已經承認了資本主義制度的爲社會主義所代替是一種歷史的必然，可是他還是懼怕着那種過渡時期的無秩序狀態。他們雖然很明白地看到了一個世界社會主義勝利的前途，可是同時他們就焦急着他們自己在那大的社會主義革命發生時的命運。他們的感情排斥了他們在理智上所接受的

事情。因此他們在理論上說起來也許是社會主義者，可是在實際上，他們的態度實在是支持着資本主義的制度的。蘇聯存在的本身就經常地使他們自身的存在感到了一種脆弱，同時使得他們自己的行動也感到了道義上的不對。所以蘇聯的存在，一方面果然對他們好像表示了世界上仍有理智的存在，但在其他各點上，他們可說是都並不喜歡蘇聯的，或者甚至可以說是有些傾向於憎恨蘇聯的。

正因爲了這些緣故，所以他們是歡迎着，（雖然有的時候他們自己本身並不承認）每一個可以向蘇聯身上去挑剔的機會。而這次的托派審判剛好是給與了他們這樣的一個機會。他們將這次的蘇聯審判托派，稱作『恐怖』，稱作『專制』。既然稱作『恐怖』，因此在他們看來，當然蘇聯與法西斯專政的國家是根本上沒有什麼兩樣，而因此他們的不贊成蘇聯當然也就是對的了。這『恐怖』兩個字就合法化了他們的動搖，不堅決，同時也就安靜了他們自己的良心。而所謂蘇聯的『專制』兩字，當然更是對於他們是一件可以拿去掩飾他們醜陋的外套了。

這許多情形，對於蘇聯，當然是不會認為奇怪的。所以齊諾維埃夫的審判，雖然已經引起了很多的人反對，可是蘇聯還是照常進行第二次的托派審判。因為在蘇聯看，這樣做後，乘戰前把他自己的國內掃除清楚了所能得到的利益是一定足以抵償從國外批評者目光中所受到的損失的。

總之，我覺得有許多西方智識份子所對蘇聯採取的態度，實在是短視而且不良，他們根本不會看見今天蘇聯工作對於全世界的重要性，他們也不明白歷史是決不能戴了白手套創造的。他們只是單純地根據了他們的標準去看在蘇聯到底有多少自由，多少民主。不論蘇聯社會制度的最後目的是多少合理，多少地合於人道，可是這些西方智識份子所嚴厲批評的却是她的方法。因此，在他們這班人看起來，目的倒也許不是重要的，方法反比了目的重要。可是事實上，一切方法的好壞，當然是必須依據了目的而後才能判斷的。在我認為一個強盜去打死一個過

路人與警察去打死這個強盜，這中間是有着一個很大的不同的。

因此，清楚而且簡單地說起來，這也許就是今天橫放在每一個有良心的智識份子面前的問題。因為社會主義經濟是不可能沒有一些對於今天的所謂民主制度的修正就實行的。因此我們就必須在兩者之間選擇一下——還是讓廣大羣衆繼續挨餓，而我們的自由不受限制呢，還是讓我們自己的自由稍為受些限制而廣大的羣衆可以因此得到飯吃？

當然，我們今天如果要在蘇聯找過失，這一定會是很容易達到目的的。在今天的蘇聯還正充滿了物質上，與精神上的缺點。而這些缺點，蘇聯也並不隱瞞。不過，如果有什麼人將這些缺點過分強調，而將重大的事情反看作次要的話，我想那是正同一個批評家去批評頭等天才所寫的詩把他的標點錯了一個作為最緊要的批評一樣的無聊。

今天我們在西方所能呼到的空氣已經完全是陳腐而又污穢的空氣。在西方文明中現在已幾乎沒有堅決這一會事。許多人對於強權不但不敢用實力去對付甚至連說話都不敢說得強硬一點。那些當局反對法西斯主義的說話正是可說極盡婉轉和平的能事。誰不會爲了當局對於法西斯侵略西班牙事件的軟弱與虛偽而感到頭痛呢？

可是我們如果到蘇聯去，那麼我們所能吸到的空氣就完全不同了。這完全是一個新的世界。這個世界不用人民再到天堂去，他已使天堂搬下來變成是更接近人民的東西了。

看慣了西方的妥協，再看到蘇聯的精神，是一定會使人感到禁不住的說『好的。而我也正因為覺得如果不將這『好』字說出來有些對不住自己的良心，我就寫了這本書。

# 莫斯科觀感錄

陸甯甫著 實價三角

這本小冊子的十幾篇文章，是作者漫遊莫斯科時所得的印象，在他的輕鬆雋趣的筆下，描繪出十月革命後的新社會建設，同時表現出社會主義的精神來。

# 蘇聯印象記

章勃著 邵宗漢譯 實冊一 價四角

本書是英國費邊社健將章勃夫婦於一九三二年赴蘇聯實地考察後所作，詳述蘇聯的經濟生命，勞動狀況，出版事業，婦女兒童家庭，蘇維埃統治下的自由，蘇聯是不是民主政體等，極為新穎深切，每篇前並附精印插圖十餘幅。實為研究蘇聯必備之參考書。

# 萍踪寄語

韋奮著

初集 八角  
二集 四角  
三集 一元

作者遊歷歐洲，考察新聞事業，兼及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各方面。萍踪所至，隨時精密觀察，作雋永的敘述，下正確的判斷。初集以上海啓程至英國為段落，對於資本主義最後壁壘的英國內部孕育着的危機，作了詳盡而深刻的描寫。第二集寫作者從英國動身，漫遊法比荷德諸國，記述了歐洲的社會現狀，探明所謂法西斯運動的所由來，以及加速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原因。第三集為作者和一羣前進的美國男女青年遊歷社會主義的蘇聯。用充滿着愛與力的筆，描繪了新社會建設的進步，文化的提高，人民大眾生活的愉快，政黨組織的嚴密等等，卷首附有長序。

各地生活書店發售

# 二十年的蘇聯

沈志遠 編著 一冊實價五角  
張仲實

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突飛猛進，及其國勢的蒸蒸日上，已引起了全世界的深切注意。去年十一月七日適為蘇聯「十月革命」的廿週年紀念，因此，一般對於蘇聯各門建設的總結，大感興趣。在目前我民族以血肉爭取自己的獨立和自由的偉大鬥爭中，研究蘇聯奮鬥的經驗和建設的成就，更可給我們以不少的鼓勵和借鏡。本書即是為了適應這一需要而編著的。內容共分十一章，對於蘇聯革命的經過，經濟建設的諸階段，第一、二、三、五年計劃的成就，政治制度和新憲法，民族政策，民衆物質文化生活的增進，及一般社會生活和國防等，都有簡明扼要的敘述。並有精美插圖百餘幅，尤為珍貴。

蘇聯新憲法研究

張仲實編譯 一冊三角

蘇聯婚姻法

鄭競毅著 二分五角

蘇聯軍隊中的政治工作

伍曼文譯 一冊六角

## 蘇聯革命與中國抗戰

胡愈之 編  
一冊實價四角

各地生活書店發售

# 莫斯科記

每冊實價國幣叁角  
外埠酌加郵費

著者

雷翁·傅克脫惠格

譯者

吳大琨

發行者

生活書店

印刷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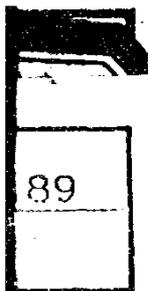
生活印刷所

漢口：交通路六十三號  
廣州：漢民北路五十一號  
重慶：武庫街二十七號  
香港：皇后道一七五號  
西安：長沙道一七五號  
桂林：貴陽街昆明都  
宜昌：萬縣街陽明都  
天水：南鄭街陽明都  
金華：麗水街常德  
沅陵：上海街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廿七年十一月一初版(S)

活生



\$0.30